

●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 主编 任继愈 ●



ZGWHHSZS

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李用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责任编辑／冯世平

●装帧设计／王 岐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过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与生活习俗等12个方面，分110个专题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ISBN 7—5035—0507—9

G·23

定价：2.30元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主编 任继愈●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中国古代法制 史话

李用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45767

(京)新登字 100 号

责任编辑 冯世平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任志珍
责任校对 胡林妮

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李 用 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 4.5 印张 59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00 册
ISBN 7-5035-0507-9/G·23
定价: 2.30 元



独角兽(麒麟)(北京明十三陵石雕)



中山国铜钺(战国) 钺面铭文记载周天子封侯于中山国，以此钺表示“王权”和“王法”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辟雍(四川成都东郊五代后蜀张虔钊墓室棺床壶门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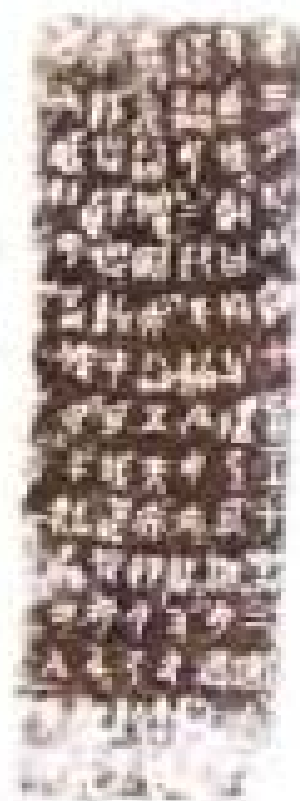


杀人祭铜柱
贮贝器（西汉
青铜器），器上
铸有待刑者形
象 云南省博
物馆藏



《唐律疏
议》（元至
顺年间刻
本）北京
图书馆藏

刑卹銘之
拓片，內容為
一審理地產告
的判決



刑卹奴隸卹
(西周青銅器)
故宮博物館藏

《元典章》
(清代影抄
元刻本)
北京图书馆
藏



秦诏版
1959—1961年
间在陕西咸阳
(秦都)出土



秦诏版铭文，
有“灋度量則不
壹 疑者皆明壹
元”等字迹

秦代竹简（1975
年12月在湖北省
云梦县睡虎地出
土）简上载有秦
代法律和文书等
内容





《大明律》
(明正德十六年
刻本) 北京图
书馆藏



《唐六典》
(明正德年间
刻本) 北京
图书馆藏



《宋刑统》
(中华民国十年嘉业堂刻本)



《大清律》
(清雍正五年刻本)北京图书馆藏

编者献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界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 56 个民族的文化)长期

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摒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透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

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而的 110 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 年 2 月 22 日 北京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编：任继愈

副主编：冯钟芸 游懿钧 焦树安

编 委（按姓名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戴念祖	郭齐家	金祖同
李思敬	卢海森	路柱明
马椿根	欧阳中石	鹿 朴
戚志芬	任雪芳	沈心天
谭其骧	汤一介	王世民
王兆春	吴翊场	吴 可
吴良镛	严如炳	张华纳
张明华	张习孔	赵 强
赵匡华	钟楚惠	周 强
朱光潜		

〔有·考为执行编委〕

目 录

引言	1
一 开创篇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5
1 “神兽决狱”的传说	5
2 夏礼、殷礼	
——夏商王朝的大法	7
3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8
4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11
5 周公制礼和商周的礼治	14
6 西周的《九刑》和《吕刑》	18
7 刑法和礼治的原则	19
8 西周的土地所有权和奴隶买	
卖	23
9 西周的婚姻制度	26
10 夏、商、西周的司法制度	28
二 奠基篇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法律	

	制度·····	33
1	公布成文法的斗争·····	33
2	李悝著《法经》，封建法典之祖···	35
3	商鞅变法，明法重刑·····	37
4	秦始皇统一法度，凡事皆有 法式·····	39
5	秦代的严刑酷法·····	43
6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46
7	从“约法三章”到汉律六十篇·····	50
8	汉代的刑法·····	54
9	儒家思想入律，汉律开始儒化···	58
10	汉代的经济法规·····	61
11	秦汉时期的司法制度·····	64

三 定型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70
1	隋文帝与《开皇律》·····	70
2	封建法典的楷模——唐律·····	73
3	隋唐时期的刑法·····	78
4	中国封建制民法的雏形·····	85
5	中国封建婚姻家庭制度·····	90
6	唐代的经济立法·····	93
7	唐代的司法制度·····	97

四 发展篇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	…103
1 宋朝的立法	……103
2 宋朝刑法的特点	……106
3 宋朝的租佃制和典卖制	……109
4 元代立法和元律的特点	……111
5 朱元璋与明朝立法	……114
6 明律的主要特点	……118
7 明朝的经济立法	……120
8 清朝立法和清律的特点	……124
9 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128
10 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130

引 言

中国古代法制史,自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王朝跨入奴隶社会开始,直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已有 4000 多年。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不断加强立法和司法措施,维护它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形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法制历史。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奴隶制时期,三代的法制是奴隶主贵族维护奴隶制生产关系、镇压奴隶反抗的工具。

春秋中叶以后,奴隶制土崩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封建制。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各国用立法手段维护新生的封建生产关系,涌现出一批主张以立法政制而著称于世的政治家,如子产、邓析、李悝(kuī 亏)、商鞅等,真是群星璀璨;同时,产生了大批立法典籍,铸刑书、铸刑鼎、著法经等,真是斑驳陆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了封建专制

主义的统治,封建立法也随之趋于完备、周密。经过 1000 余年,到唐代达到辉煌的顶峰。

中国古代法制史,积累了具有中华民族独特内容和形式的法律系统,即中华法系。它以历史沿革完整,内在联系紧密,发展顺序清晰,文献资料丰富,民族特色鲜明而著称于世。中华法系作为中国法律文化,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特点是很鲜明的。

特点之一是中国古代法制以专制王权或皇权为依归。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

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另一个特点是以或文刑法为主体。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或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第三个特点是自西汉以后的法律以儒家思想为指导。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chù 触)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

系,具有浓重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学习中国古代法制史,要褒扬中华法律文化的精华,贬谪其中的精粕,鞭挞剥削阶级法制中残酷反动的本质,达到以史为鉴的目的。

一 开 创 篇

——夏、商、西周的法律制度

公元前 21 世纪,中华民族生息蕃衍的古老土地上,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继夏而起的是商和周,都是奴隶制大国。夏商周三代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设置司法官,制定了法律,开创了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的篇章。

1 “神兽决狱”的传说

在原始社会,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氏族和部落内部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是靠不成文的习惯来调整的。这些习惯具有约束力,一切氏族成员都必须遵守,违犯了它也要受到惩罚。中国古代文献上记载:“神农无制令而民从”,说明古代氏族社会的首领神农氏并没有后世的法律、法令一类东西,但民众都服从他、拥护他。

相传部落联盟的杰出首领舜,任用皋

陶为司法官。皋陶执法公平，正直无私，深受人们的爱戴。他断案时，依靠一头名叫獬豸(xiè zhì 谢致)的神兽来判断是非曲直。这个神兽既像羊，又像麒麟，浑身是油光闪亮的青毛，头上长一只锋利无比的触角。后人称它为“独角兽”。这个神兽能识别人间的罪行，在人们争讼时，将触角往理亏的一方触去，是非曲直，一触便得分晓。这就是“神兽决狱”的神话传说。

其实，传说中的“神兽”，是原始社会人们的一种图腾崇拜，用它来维护氏族社会的共同传统和习俗。由于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自身的智慧和力量还没有认识，便把分辨是非曲直和惩罚不轨行为，统统看作是神的意志和神的决断。“神兽决狱”的故事，大概是后人按照司法审判的情况添加进去的，用来告诫人们要守法，否则将由它的决断而受到惩罚。

“神兽决狱”的传说，在创造古法字“灋”时，被融化进去了。对这个古法字，《说文》解释说，灋，从水旁，有“平之如水”、均平、公正、不偏不倚的意思。“廌(zhì 致)，就是神兽獬豸，即独角兽，它性知有罪，有罪

则触，无罪则不去触。触到不直的人和事，去之。所以，灋的右下边是“去”字。“法”字的字面含义就有公正地辨明和处理是非曲直，限制、约束人们行为的意思。可见，“灋”字是古代“神兽决狱”的象形字，它恰当地表达了人们要求伸张正义，铲除人间不平的美好愿望。

2 夏礼、殷礼——夏商王朝的大法

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基本的社会规范，也是中国奴隶制国家的主要法律形式之一，是不成文的习惯法。

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形成了以父系血缘氏族为主体的农耕社会，达时产生了许多原始习俗。例如，氏族中的父权独尊，以丈夫奴役妻子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以膜拜神灵保佑丰收为目的的祭祀制度，等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古老的原始习俗中，凡是有利于巩固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进一步得到完善和补充，使其更加规范化，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这种不成文的习惯法，

通称为“礼”。

由于这些“礼”是不成文的，加上世代更迭变迁，社会动乱，已无法考证了。但是，孔子在《论语》中说，他对夏礼和殷礼都能够讲出来，可惜无法从文化典籍中加以证实了。孔子的话说明，历史上确实有过夏礼和殷礼，它们同后世的周礼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奴隶主阶级治国安邦的大法。

夏商的礼制，无论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以神为核心。夏商奴隶主对天神极为敬畏，经常举行隆重的祭祀，无论是国家大事和个人生活小事，都要通过巫师占卜，向天神“请示”。一切都借天的名义行事。王位是天授予的，称为“天命”；军事征伐称为“天讨”；惩罚犯罪称为“天罚”。夏商是典型的神权法时代。

3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相传禹继尧舜之后建立了夏朝。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夏王，发布各种命令，当时叫诰、训、誓等。这些都是夏朝法律的表现形式。例如，《尚书·甘誓》记载，夏后启准备讨伐

有扈(hù 户)氏时,在“甘”这个地方(今陕西省户县西南)发布战争动员令,史称为“甘誓”。这个动员令说,有扈氏犯了不敬上天和不重用大臣的罪行,引起天怒人怨,现在我奉上天意志对他进行惩罚。接着,他命令士兵们要勇敢打仗,表现好的在先朝神位面前给予赏赐,不奉行命令的,在社神(祭祀土地的神坛)西前予以惩罚,变为奴隶或杀掉。这种命令就是夏朝的一种法律形式。

刑,是夏朝法律的另一种形式。刑的起源同战争有关。刑起于兵,兵刑同源。原始社会时,氏族、部落之间常常发生武力冲突,在战争中捉到的俘虏一般是杀死了事。当对杀死俘虏的手段是很残酷的,有割耳、截鼻子、挖眼睛、断手足、斩颈、剖心等等,这是原始人的习惯。进入阶级社会后,社会生产力提高了,俘虏不再杀死,而是驱赶他们去劳动,成为奴隶。奴隶主对奴隶据有生杀大权。这样,杀害俘虏所用的种种残酷手段统统以“刑”的形式加到奴隶们的头上。后来,对非奴隶的其他社会成员的违法行为也处刑了。所以,早期古代的“刑”字,既

有惩罚犯罪的意思，又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法”字使用。

夏代法律在古文献称“禹刑”。《左传·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其实，以“禹刑”来称呼夏朝法律，是表示对开国君主和杰出祖先禹的崇敬和怀念。而汉的《尚书大传》中有“夏刑三千条”的说法。东汉郑玄为《周礼》作注解时也说夏代的刑法，有死刑 200 条，宫刑（毁坏生殖器）500 条，膞（bìn 髻）刑（凿去膝盖骨）300 条，劓（yì 易）刑（割掉鼻子）1000 条，墨刑（在犯人而上或额上刺刻并涂墨）1000 条，加起来共 3000 条。这些都是后人的追述，只能作为参考了。

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说，著名司法官名叫皋陶，他制定刑法时，规定了“昏墨贼”三种罪。“昏”，是掠夺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强盗罪；“墨”，是不洁的意思，相当于今天的贪污罪；“贼”，是相当于今天的杀人罪。凡犯这三种罪的都处死刑。此外，还有不孝罪。夏代血缘关系有很强的约束力。《孝经》中说：“罪莫大于不孝”，说明不孝罪是一种重罪。

夏代已经有被称为“五刑”的刑罚。这五种刑罚就是墨、劓、剕(刖)、宫、大辟(杀)。

墨刑,又称黥(qíng 晴)刑,是在罪犯面部或额上刺刻后涂上墨的刑罚。

劓刑,是割掉鼻子的刑罚。劓刑重于墨刑。

剕(fèi 废)刑,又称刖(yuè 月)刑,是锯断犯人的脚的刑罚。古时劓刑用刀,剕(刖)刑用锯。

宫刑,是割掉男犯人的生殖器,闭塞女犯人的生殖器官的刑罚,最初用来惩罚淫乱罪。

大辟,是杀头处死的刑罚。

相传上述五刑是禹继尧舜之后建立夏朝时创制的。

4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

商是中国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灭夏后,一方面沿用商部落的某些传统习俗,袭用夏朝法律;另一方面商王根据新情况颁布新的诰、训、谕等命令,形成商朝的法律。

《左传·昭公六年》记载:“商有乱政,面

作汤刑。”这里所说的“乱政”，主要是指当时奴隶和平民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而“汤刑”，并非全是商王成汤所作，而是商代法律的总称，是为了表示对商朝开国君主成汤的崇敬和怀念，取名为“汤刑”的。“汤刑”不仅全部沿用了“禹刑”中的五刑，还广泛实行族刑。《尚书·泰誓》中说：“罪人以族”，就是指一人有罪，其父母、兄弟、妻子都要处刑。

商代的法律也已失传，从后世的文献可略知一二。据《尚书·伊训》记载，商朝吸取夏朝末代国王桀因贪财好色终政亡国的教训，制订了“官刑”。“官刑”的主要内容是专门惩治犯有“三风十愆(qiān 千)”罪行的贪官污吏。所谓“三风”，指巫风、淫风、乱风。巫风，是日以继夜地恒舞于宫，酣歌于室。古代的舞与歌原本是神巫的事情。淫风，是贪货色，好游畋(tián 田)。“乱风”，是狎侮圣人的语言，拒绝忠直人的规劝，疏远年老有德的人，亲近幼稚顽嚚的人。“十愆”，是包括三风在内的十种罪过。如果贵族高官犯了这些罪，要取消他们的身份和特权。如果君王有这些行为，臣下不去帮助

改正，要受到墨刑的惩罚。

商代除了沿用夏代的一些罪名，还增加了一些新罪名。《尚书·盘庚》中说：“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guǐ 鬼)，我乃劓殄(tiǎn 舔)之，无遗育。”这里就立了三种新罪名：一是“不吉不迪”罪，是指行为不善，不按商王指出的正道办事；二是“颠越不恭”罪，指狂妄放肆，不遵守法纪，不恭敬国王的行为；三是“暂遇奸宄”罪，暂是指欺诈，遇是指奸邪，在外作乱为奸，在内犯法为宄，也就是说，用欺诈、奸邪的手段，犯法作乱的行为。凡犯了这三种罪行的要处“劓殄”之刑，即不仅要杀死本人，还要把他的后代统统杀掉，不留“遗育”。

商代的刑罚以严酷著称，以死刑和肉刑为主刑。死刑有炮烙、醢、脯、剖心、劓殄、戈伐等。肉刑则广泛使用夏代的墨、劓、剕、宫刑。

炮烙刑，据《列女传》记载，是在一根横放着的大铜柱上涂上油脂，下边燃起旺旺的炭火，强迫犯人赤脚在铜柱上行走，犯人走不到几步就掉落到炭火中被活活烧死。

醢(hǎi 海)刑，是把人剁成肉酱。脯(fǔ

府)刑,是把人割成一条条,晒成肉干。剖心刑,是剖开人的胸膛,挖出心脏。《史记·殷本纪》记载商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观其心”的事。九侯有一女儿送到纣王那里去当侍女。她不愿意过荒淫的生活,纣王便把她杀死了,并且把她的父亲九侯也处醢刑,剁成肉酱。鄂侯得知此事,怒斥了纣王的暴行。纣王便把鄂侯处了脯刑。比干是纣王的叔父,常常劝谏纣王,措辞严厉,纣王恼羞成怒,剜了比干的心。

剕殄刑,即族刑,是商代死刑中的最高刑。

戈伐,是用戈杀头,即斩、戮(lù 路)。有一条甲骨文写着:“允戈伐二千六百五十六人”,记载了允这个奴隶主杀死 2000 多人的事实。

5 周公制礼和西周的礼治

商朝西北方的陕西岐山一带有一个叫周的小国,一天天强盛起来。许多臣服于商王朝的诸侯国,尊周王为领袖了。公元前 1027 年,周武王带领 3000 勇士,45000 甲兵,联合八百诸侯,来讨伐商纣王。商军中

不堪压迫的奴隶兵，在阵前倒戈，愤然起义，终于推翻了商朝统治，建立了周朝，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

周朝建立后，如何处置商殷的百姓，怎样控制疆土等问题，在重臣们内部发生了分歧。军师姜太公主张把殷人都杀光，以绝后患。贵族召公奭（shì 式）主张逆我者死，顺我者活，即“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治之”，区别对待。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提出封纣王的儿子武庚，留居商都，“以商治商”，并主张：“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至亲。”（《尚书大传·大战》）意思是说，保持原来的社会关系不变，利用殷商贵族进行统治，如果有人作乱，不让过平安的生活，无论是周人或殷人都应该反对。

周朝建立两年后，武王逝世，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叔父周公辅政。据说，周公以周朝原先的习惯法为基础，同时吸取夏商两朝礼仪制度中 useful 部分，经过整理，制订成周礼。这只是传说，还有待考证。

西周是典型的礼治时代。西周的礼治，主要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世袭制三位一体的政治统治。

宗法制是礼治的基础。宗法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系统，它由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演化来的。其内容包括：全族人尊奉共同的祖先；宗族以父系计算，由嫡长子为当然继承人；嫡长子为大宗，其余儿子为小宗，大宗率领小宗，小宗必须服从大宗。周代的宗法制把宗族组织与国家组织直接挂钩，从周天子到士，形成一个以血缘关系相维系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国家制度就是一个放大的家族制度。

分封制与宗法制是密不可分的。周天子按宗法制原则把土地和人民分给自己的兄弟和亲属。周初，分封的诸侯国有 71 个。例如，周公旦封于鲁，康叔封于卫，唐叔封于晋，周武王的母舅姜太公封于齐。分封制形成了以周天子为中心和最高层次的，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依次排列的，金字塔式的奴隶主等级结构，使宗法等级和政治等级合而为一，宗族权力和国家政治权力互相结合，造成亲贵合一、家与国一体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种制度中，下级贵族要服从上级贵族，全国要效忠天子。各诸侯国除了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等方

面享有较大的独立性外，还要承担朝覲述职、守卫疆土、交纳贡赋、提供徭役等义务。所有这些权利和义务，周礼都有规定。

世袭制是从天子到士各级贵族的王位或爵位、财产、权力都由嫡长子继承，世代相传的制度。奴隶主贵族实行多妻制，正妻为嫡，所生儿子叫嫡子；其余妻叫庶，所生儿子叫庶子。王位或爵位的继承权，只属于嫡长子；嫡长子死亡由嫡长孙继承。如果嫡妻没有生子，可以立级别最高贵的庶妻之子来继承。这种继承制度的确立，可以防止诸子之间争夺继承权，有利于“定分止争”，巩固统治秩序。

上述三个制度体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亲亲”和“尊尊”。按血缘关系确定亲疏、长幼，称为“亲亲”。亲亲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是孝。按宗法等级确定政治上的贵贱、尊卑，称为“尊尊”。“尊尊”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是忠。由于周礼能够“别贵贱、序尊卑”，实现“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宗法政治秩序，所以成为西周奴隶制国家的根本大法。

周礼除了上述三个基本制度外，还包

括五方面的礼仪：一是吉礼，即关于祭祀天神、社稷神、山川神、祖宗神的礼仪；二是嘉礼，包括达到法定成年人年龄而举行的冠礼，为媒聘、定亲、迎亲而举行的婚礼，为宗族内部敬老睦族面举行饮宴活动的乡饮酒礼；三是宾礼，关于诸侯朝见天子、诸侯之间会盟的礼仪；四是军礼，关于征伐和治理军队的规定；五是凶礼，关于丧葬方面的礼仪规定。可见，周礼的内容十分广泛，大至国家的祖本法，小至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都有礼仪规范；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婚姻家庭、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典章制度、礼节仪式，又有刑事、民事、行政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规范，其核心是确立周朝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制度——宗法等级制度。

6 西周的《九刑》和《吕刑》

西周时，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刑法制度更为发展，罪名和刑名更多了。其罪名有：放弑君王罪，违犯王命罪，不孝不友罪，暴乱罪，杀人罪，杀人劫财罪，窃盗拐骗奴隶罪，聚众饮酒罪，等等。

在刑罚方面，除沿用夏商时期的五刑外，还增加四种刑罚，即流、赎、鞭、扑。流是流放，赎是用铜赎刑，鞭是用鞭子打，扑是用木板打。共有九种刑罚。有“周有乱政面作九刑”之说。《九刑》又称“刑书九篇”，是周制定的成文刑书。

到周中期，由于周穆王好大喜功，四出征伐、游玩，耗尽了周朝初期 90 年的积蓄。为了掠夺财富，穆王命令司寇吕侯修订《九刑》，制作用铜赎刑的刑书，称为《吕刑》。它规定可以用黄铜赎五种刑罚。墨刑罚百锾(huán 环。古代铜货币单位，一锾重六两)；劓刑加倍，即 200 锾；剕刑罚 500 锾；宫刑罚 600 锾，死刑罚千锾。赎刑的制定，给中国古代刑罚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不过，赎刑只是贵族的一种特权。

《吕刑》中除了有关赎刑的规定外，还规定了一系列刑事政策、刑罚原则、诉讼制度和法官责任等。

7 刑法和礼治的原则

奴隶主阶级在运用法和礼进行统治时总结出一些原则，从这些原则中可以看到

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说：“与其不辜，宁失不经。”“辜”是罪，“经”是常法。意思是说，宁可不按常法办，也不能错杀无辜的人。这个原则被后世所传颂。

《尚书·大禹谟》中说：“罚弗及嗣”；“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这里提出了四个原则，即：施用刑罚限于本人，不诛连子孙；过失犯罪里然后果严重，也可以从宽；故意犯罪里然轻微，也要加刑；犯罪情节有疑点的，处刑时要从轻。

《尚书·吕刑》中有：宽严适中；刑罚世轻世重；以情定罪；疑罪赦免等原则。“宽严适中”是说定罪量刑要中正，不偏不倚，不轻不重，恰到好处。“刑罚世轻世重”，又叫时轻时重，是说适用刑罚要有灵活性，根据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以情定罪”，是说犯了重罪，但属于过失，可以适用轻刑、减刑处罚；虽然犯的是轻罪，但如果是故意犯罪，则要适用重刑，加等处罚。“疑罪赦免”，是说对于疑难案件或一时搞不清楚的案件，要降级处分，或免于刑事处分。

而周时还提出宗法伦理原则，“礼不下

庶人，刑不上大夫”，“明德慎罚”，“礼主刑辅”等原则。

西周统治者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等等宗法伦理道德看作维护统治秩序的基本规范，把违反宗法伦理的行为看作是严重犯罪，处以严厉的刑罚。例如，《周礼》规定：“凡杀其亲者，焚之。”在诉讼制度上也体现这一原则。例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因此，复仇被视为孝道而得到认可。按照《周礼》规定，要报仇的人，只要到有关官吏那里登记仇人的姓名，将仇人杀死便可以无罪。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是公开的奴隶主阶级特权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礼不下庶人”，是说礼主要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周礼中所规定的各种特权，只有奴隶主贵族有权享用，奴隶和平民都无权享受，不得僭越。如有越礼行为，便构成严重犯罪。这里不是说庶民不受礼的约束。在婚姻、丧祭等方面的礼仪，庶民也要遵守。“刑不上大夫”，是说刑法锋芒不是指向奴隶主贵族，3000 条刑律，不设大夫犯罪的条目。当然，并不是说贵族犯

罪不用刑罚。在周代，违礼即违法，失礼要入刑。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对违礼的贵族也要加以刑罚制裁。不过，贵族在受刑罚制裁时享有种种特权。例如，死刑不公开执行，或让犯法贵族本人在隐秘处自杀；不处宫刑；受朝廷册封的贵族及其妻子，所谓“命夫命妇”，不必亲自到庭受审，可以派人代理，等等。在“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刑法基本原则指导下，奴隶主贵族和平民犯罪，实行同罪异罚的不平等对待。

所谓“明德慎罚”，是西周奴隶主阶级吸取商朝灭亡的教训提出的较为进步的原则。他们认识到光靠神权已不能维持和巩固政权，一味镇压也行不通，因此提出“明德慎罚”的原则。“明德”，指尚德，注重德教，对犯罪者要实行宽缓的政策。他们认为，有德者才能得天命，无德者必将失天命，导致亡国亡身。这是由“王权神授”的思想发展为“以德配天”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宽义。“镇罚”，是指对刑罚的适用要采取审镇的政策。例如，“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周礼·大司

寇职》），就是说，要根据各地治乱的不同情况来决定采用刑罚的轻、重。又如，对疑难的案件，必须核实案情，做到判决有根据。实际上，“明德慎罚”就是教化和慎压相结合，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进行统治。

“礼主刑辅”，是西周统治者为防止犯罪提出的一条原则。他们认为，刑是消根的规范，作用在“禁于已然”，惩罚已经发生的犯罪；礼是积极的规范，作用在“禁于未然”，预防犯罪的发生。比如，大兴婚姻的礼仪，可以防止淫佚罪；实行丧葬的礼仪，可以防止不孝罪；大讲朝聘的礼仪，可以防止犯上作乱罪。周代的各项礼治原则，可以概括为礼主刑辅，以礼率刑。他们认为，按礼祭祀天地、祖先，在社会上施行礼教，叫有德。所以，礼主刑辅，也可称为德主刑辅。这条原则对后世的立法和整个古代法制、法律文化都产生深刻影响。

8 西周的土地所有权和奴隶 买卖

周代是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西周实行土地国有制，“溥天之下，

莫非王土”(《诗经·北山》),普天之下的土地都属于国王所有。王有制,也就是奴隶主国家所有制。虽然,周灭商后,“受民受疆土”,即把奴隶和土地分封给诸侯和大夫,但从法律上说,诸侯和大夫对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准买卖。《礼记·王制》说:“田里不鬻”。鬻(yù 育),出卖的意思,不鬻,就是不准买卖。

西周中期,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开始作为买卖、赔偿和出租的对象,土地国有的制度被冲破了。

《卫盂(hé 禾)》铭记载,有一个名叫矩伯的人,用他所占有的田为代价,同管理毛皮的官员名叫裘卫的人,先后两次交换礼玉和皮币。第一次,矩伯用舍田十田换得值80朋的玉璋。朋是当时的货币单位。第二次用舍田三田换得赤色虎皮两张、牝鹿皮饰西件和文饰的蔽膝一副,价值20朋。这是土地买卖的例子。此外,《矢人盘》铭和《卫鼎(甲)》铭还记载了贵族用土地作赔偿和出租的例子。

在奴隶制时代,奴隶和牛马一样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奴隶享有完全

的所有权,可以任意买卖、转让、赠予、赔偿以至杀死。《大盂鼎》铭记载,周康王一次赏赐给盂 1700 名奴隶。《召(hū 忽)鼎》铭记载,一个名叫召的奴隶主用“匹马束丝”(一匹马加一束丝)买到五名奴隶。可见,奴隶可以买卖,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又有一次,遇到荒年,一个叫匡季的奴隶主带人抢了另一个奴隶主召的禾十秭(zǐ 子)。召告到上司东宫,要求赔偿。匡季起初答应以“五田四夫(奴隶)”赔偿损失,后来他赖账。最后,东宫判决匡季加倍赔偿。匡季不得已,用“田七田,人五夫”作了赔偿。

上述古籍记载的事例说明,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要内容:所有权和债权,在西周时就已经出现,并且有一定的法律规范加以调整,已有民法的雏形。

另外,今天经济生活中的契约,或称合同,在西周也已出现。契约是当事人双方(或数方)关于设立、变更、消灭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西周时,买卖奴隶、牛马用的是“长卷”,或称为“质”;买卖兵器、珍宝时用的是“短卷”,或称“剂”。双方发生争议时,“质剂”便是决断的证据。“质剂”两书一扎,

一分为二，双方各执一份，是由官府设置，由质人替买卖双方制作的。债务契约的契卷叫“傅别”。“傅”，是指附着约束的文书，即把债的内容写在契卷上。“别”，是在简扎中间写字，然后一分为二，双方各执半扎，扎上的文字为半文。质剂、傅别，都是契卷，用于买卖行为的凭证。

9 西周的婚姻制度

西周的婚姻制度继承夏商时的一夫一妻制，但在奴隶主贵族中盛行一夫多妻制。《礼记·昏义》记载，当时的国王，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二御妻。而且，当时还有一种习俗叫做媵(yìng 映)嫁制，或称媵妾制，即妇女出嫁时，其妹妹和侄女从嫁到夫家的一种制度。

西周时，婚姻要合乎礼制的规定，才会被社会所承认。首先要有“父母之命，媒之言”。其次要按聘娶礼制，遵守“六礼”的习俗。“六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币、请期、亲迎，是古代六道结婚程序：“纳采”，是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后，男家备礼前去求婚。“问名”，是男家请

媒人到女家问女方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然后由父母到宗庙去求神问卜，求决于祖先鬼灵。“纳吉”，是男家卜得吉日良辰之后，备礼通知女家，正式缔结婚姻。“纳币”，又称“纳征”，是男方将聘礼或聘金送给女家，所谓“非受币不交不亲”，“无币不相见”，交了钱财才能成亲。“请期”，是男家选择好吉日定为婚期，备礼告知女家，求其同意。“迎亲”，是新郎亲自到女家迎娶。这种婚姻程序是包办强迫与买卖婚姻相结合的体现，充满浓厚的迷信色彩。

西周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当时人们已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的道现。这一点有重要进步意义。恩格斯说过，凡限制血亲婚配的部落，“其发展一定要比那些依然把兄弟姐妹之间的结婚当作惯例和义务的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页）

在离婚方面，西周已有“七去”的规定。妇女有不顺父母、无子、淫乱、嫉妒、恶疾、多言、窃盗这七种情况之一的，丈夫可以把她赶出家门。这个规定说明，妇女的离婚问题，取决于丈夫，主要取决于父母，妇女处

于无权地位。

10 夏、商、西周的司法制度

夏代，夏王是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官。夏王以下，在中央设“大理”，协助夏王掌握司法审判权；在地方设“理”，又称“士”，审理地方管辖的各类案件。

商代，商王掌握全国最高司法审判权，中央设“司寇”，地方设正、史等司法官吏，各地诸侯也分别掌管本地司法权。

夏、商时代司法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一样，虽然还很不完善、很简陋，而且详细情况已不可考，但已表明司法职能是国家职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到西周时，司法机关比夏商时更完备些，各种职能机关都有较明确的分工。周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当然也是最高司法官。中央也设司寇，并已发展成为专门的司法机关，不再负有军事统兵的任务，另设司马专管军事。司寇掌管国都刑狱，维持京都治安，复审地方上交的案件，并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和公布等事宜。司寇以下设“士师”、“青史”、“司刑”等官职，协助司寇具体处理

刑事案件；又设“市师”或“贾市”，具体处理货物交易中的民事纠纷案；设“夏官”“地官”，处理土地、婚姻案件。这种根据案件的不同性质和特点，分设不同的司法官加以管理的做法，比前代有较大进步。在地方，国都以外百里以内，称为国中，设司法官“乡士”；国都百里以外三百里以内，称为郊，设司法官“遂士”。乡士和遂士负责掌管审理所辖范围的刑事案件。

商、西周已形成诉讼制度。

据史书记载，商代对重大案件从立案到审讯，要经过“三审”。正史司法官为一市，大司寇为二审，商王和三公为三审。在司法审判中开始注意事实，如有疑案，征求公众意见，公众仍怀疑，则宽大处理，所谓“众疑赦之”，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商代崇尚神权，巫、史、祝、卜等掌管祭祀的官员在国家中享有显赫地位，他们也参与司法工作。那时盛行“神明裁判”，即用“神”的力量来审理案件。商王就是无事不卜，也无日不卜，定罪行刑都要经过占卜作出决定。

西周的诉讼制度比夏商时更进一步，已有狱和讼的区别。“狱”，指刑事诉讼，即

“告之以罪名者”；“折狱”，就是审理刑事案件。“讼”，指民事诉讼，即“以财货相告者”；“听讼”，就是审理民事案件。西周有路鼓和肺石等直诉制度。王宫门外设立路鼓或肺石，蒙冤者可以通过击鼓，使案情直诉到国王，或者在肺石旁站立三天，官吏要把案情上报，不报要治罪。这样加强了国王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后世封建统治者仿鼓这种做法，发展成为登闻鼓制度。

在诉讼中，西周比较注重原告和被告双方的供词，特别是被告的口供。没有被告的供词，一般不能最后定案。除口供外，有时还要人证和书证。例如，审理土地案件，要有地比和图等物证，审理财产纠纷案件，要有“质剂”和“傅别”等契卷作为定案的根据。重大案件在起诉时要有诉状，要缴纳诉讼费“束矢”或钧金（20斤铜）。审讯时，“以五声听狱讼”，所谓“五听”，指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即对被告人的言词、声色、气息、听聆、眸子等方面表情进行观察。这是察颜观色的形而上学的审讯方法，它是长期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把心理学运用到司法审判实践中去，比起夏商时的神

明裁判、神断天罚，有很大进步，被后世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用。

夏、商、西周时，以法官坐堂问案作为审判的主要方式，原告和被告席地相对而坐。西周时大夫以上的官僚贵族享有不必出庭的特权，同时还规定优待犯罪贵族的“八辟”的制度。到封建后期演化成为“八议”的制度。

西周时，当事人对判决不服允许上诉。上诉后司法官要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核实，对证据进行勘验，做到“三判”，即向群臣、群吏、老百姓三方去了解核实情况。如果司法官故意错判，要与违法犯罪者同罪同罚。

夏商周时已有监狱和监狱制度。夏代的监狱叫“圜土”，又称“夏台”。“圜土”是监牢的形象名称，是在地下挖成圆形的土牢，或在地上筑起圆形的土墙，用来囚禁俘虏和罪隶。据说，在夏朝都城阳翟“钧台”这个地方建造了中央监狱，曾囚禁过商族首领，即后来成为商王的成汤。

商代的监狱也叫圜土，有些土牢是在地下挖窖穴，上面盖上棚，并开有牖(yǒu

友)，类似今天的天窗，故又称“牖里”。《史记·殷本纪》说，商纣王曾把西伯，即后来的周文王囚禁在羑(yǒu 友)里(今河南汤阴县内)的监狱中。商代的囚犯穿特制的衣服，用绳索系于身上，从事繁重的劳动。

西周广设监狱，关押乞丐、流浪汉和其他轻微犯罪的人。监狱不仅是拘押惩办犯人的场所，而且还是依照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进行“聚教”的场所。周代设置专职官吏司圜，对犯人加强管教、看守，还视罪行轻重，带上梏(gù 固)、桎(gǒng 拱)、桎(zhì 治)三种不同刑具，梏加在颈上，桎是“两手共一木”，加在手上，桎加在足上。对重罪犯人三种刑具同时使用，中罪犯人用梏、桎两种刑具，轻罪犯人只用桎。犯人白天强役，夜晚囚禁在圜土。不许犯人与常人一样戴冠装饰，用这种方法对犯人羞辱。犯人经过强制劳动后不能悔改的加以杀死；能悔改的加以释故，但三年内不能享受常人的待遇。

二 奠 基 篇

——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法律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古代法制发生重大变化，奴隶制法制在动荡和改革的潮流中，逐渐被封建法制所代替。秦始皇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封建法制。汉代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较为完备的汉律体系。从战国至秦汉是中国封建法制发展的奠基阶段。

1 公布成文法的斗争

春秋时期（公元前 770—前 476 年），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公布成文法的斗争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

在奴隶制时代，法律不公布出来，这样奴隶主贵族可以任意新罪量刑。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贵族垄断法律，坚决要求把成文法律公布出来，以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权和其他权利。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

益的法家，在百家争鸣中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要求公布成文法的强烈呼喊。

公元前 543 年，郑国执政子产进行政治和经济政革，其中一项改革就是把刑书铸在鼎上公诸于众，首先打破过去把刑书藏于官府的惯例，对其他诸侯国发生了很大影响。公元前 513 年，晋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赵鞅和荀寅，带领军队在汝水旁边筑城，同时征收 200 多斤铁器铸造一个鼎，把范匄（丐）当政时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世，谓之“铸刑鼎”。公元前 501 年，郑国大夫邓析把他起革的刑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也公布出来。

成文法的公布，冲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因而遭到守旧势力的强烈反对。晋国大臣、奴隶主贵族叔向，写信给子产说：“从前我对您抱有希望，现在一切都完了。先王权衡事情的轻重来决定刑罚，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产生争讼之心，旧传统、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公布了成文法，改变以往的旧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来为自己辩解，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要想统

治老百姓就很难了。”还说：“老百姓抛弃礼仪而引证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恐怕在你活着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孔子也发出“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的感叹。意思是说，抛弃法度，铸造刑鼎，民众只是关心鼎上的法律条文，还会尊敬地位高的人吗？地位高的人，又靠什么来守住他们的地位和财产！尊卑贵贱的秩序，一被打乱，怎能管理一国的政治呢？子产在给叔向的回信中十分冷静地回答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到那么长远，我是以此来挽救当代人的。”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和做法。

公布成文法的斗争，实质上是新旧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成文法的公布，是新兴地主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中国法制史上变奴隶制法制为封建制法制揭开了新的一页。

2 李悝著《法经》，封建法典之祖

战国时代(公元前 475—前 221 年)，

各国地主阶级为建立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相继进行改革，史称“变法”。

公元前 445 年，魏国任用李悝为相。李悝是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学得一套治国安邦的知识和本领，很受魏文侯的赏识。魏文侯尊他为师，拜他为相，请他主持变法。李悝对魏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进行了一系列变革。

在法制方面，李悝在研究、比较各诸侯国的法典的基础上，取各家之长，编撰了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系统的成文封建法典——《法经》。

《法经》早已失传。据明末清初董说编写的《七国考》记载，《法经》共有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前四篇合称正律，主要内容是规定什么行为属于“盗”、“贼”犯罪，以及如何惩办这些犯罪。第五篇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的其他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包括对狡诈、越狱、赌博、贪污、淫乱、逾制等犯罪行为的惩处。第六篇具法是按照犯罪行为的不同情节给予犯罪者减轻或加重刑罚的规定。

《法经》是中国古代封建法典之祖，是

秦汉以后封建立法的蓝本,可以说,中国古代法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3 商鞅变法,明法重刑

商鞅(公元前390—前338年),原名卫鞅、公孙鞅,是卫国国君的宗族。年少时“好刑名之学”,学习李悝、吴起等人的法家理论和变法经验。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贤。商鞅带着《法经》来到秦国。不久,他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和重用,被任命为左庶长,主张变法。后因功封于商(今陕西省商县东南商洛镇),号商君,史称商鞅。

商鞅以李悝的《法经》为蓝本,并根据秦国的实际需要作了许多补充,制订新的法律。他主张“明法重刑”。“明法”,是抛弃其他各家,特别是儒家的礼治学说,用国家的法律法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重刑”,是指对轻微的犯罪行为也要处以严厉的刑罚。他认为,当人们将要犯罪的时候就给予惩罚,大的犯罪就不会发生了。

商鞅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度,取消宗室的特权,按军功的大小重新规定官爵的等级和待遇。下级士兵在战争中

勇敢杀敌的，也可以得到官爵，临阵脱逃和投降敌人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凡是进行私斗的，按照情节轻重，判处刑罚。

商鞅打破了“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有一次，秦王太子犯了法。当时，王太子是国君的接班人，不能动刑。商鞅便拿王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老师公孙贾开刀，把他们处了刑。一个割掉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虽然，王太子犯法以“君嗣”而免刑，“刑不上大夫”这条原则并没有彻底冲破，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商鞅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

商鞅变法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布奖励农战的法令：废除奴隶制时的井田制，在法律上承认土地可以私有和买卖，由国家统一收赋税的制度；凡积极耕织的人，免除他们的徭役负担，并可用多余的粮食捐买官爵；对弃农经商和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则要被罚作官府奴婢；有两个以上儿子还不分家的，加倍收取赋税，以充分发婢劳动力的潜力；凡是从别国逃到秦国的奴隶和农民，都可以分给田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徭役，有奴隶身份的还可以改为农民；有军功

的人授予上爵，如果不尽忠战事或者授敌叛逃的，本人处死并诛连家人；没有军功的贵族，不能列入宗室簿籍，取消他的爵禄和身份，不再享受贵族的种种特权。

商鞅强调法律的贯彻执行，做到信赏必罚，取信于民。《史记·商鞅列传》记载着“悬金移木”的故事：商鞅已制定了法令，但没有马上公布。他怕老百姓对新法不相信，就叫人在国都南门外树立起三丈高的一根木杆，并贴出布告说：“有谁能把这根木杆移到北门去，赏他十金。”老百姓不相信钱会有那么好赚，没有一个人来移动木杆。商鞅又布告说：“谁能够把木杆移到北门去的，赏他五十金。”有一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木杆移到北门。商鞅马上赏他五十金，表示信守诺言，不欺骗老百姓。在取得老百姓信任后，商鞅便把新法公布了。新法得到执行，变法取得成功。

4 秦始皇统一法度，凡事皆有法式

经过商鞅变法，地处西陲的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公元前 238

年，22岁的秦王嬴政，实行加冕礼，亲理朝政。这个雄才大略的秦王，顺应历史潮流，以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消除了政敌，夺取了实权，选用法家派人物治国佐政，进行兼并战争。用了17年时间，在他39岁时，即公元前221年，结束了中原几百年来的封建割据局面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帝国。秦王嬴政成为全国最高统治者。他兼取传说中“三皇”和“五帝”的尊号，改“秦王”为“皇帝”。后加上“始”字，意思是子子孙孙传下去，直到万世。从此以后，皇帝这一称号被后世历代王朝统治者所沿用。

秦始皇首创帝制。皇帝的权力无限，不受法律约束，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大权于一身。皇帝的命令就是法律，命称为“制”，令称为“诏”，印称为“玺”，自称为“朕”，从秦始皇开始，只准皇帝本人用这个自称。在中央设三公九卿制。“三公”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监察等事务。“九卿”，有奉常（掌皇帝宗庙礼仪）、郎中令（掌皇帝和宫殿警卫，护卫皇帝出巡）、卫尉（掌宫廷门卫屯兵）、太仆（掌

马政)、廷尉(掌刑狱)、典客(掌属国外交事务,又是典礼官)、宗正(掌皇族亲属事务)、治粟内史(掌农业、粮食、盐、铁的财政收入)、少府(掌山海池泽的税收,以供养皇室,又是皇帝的秘书)。在地方,秦始皇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全国分 36 郡,郡下设县,开创了我国封建社会 2000 年之久的中央、郡、县三级管理体制。

秦始皇统一文字,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车轨,并非常重视统一法度,明确宣布“作制明法”权在皇帝,臣下责在执行。皇帝的命令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国家最基本法律形式之一。这一点被后世所沿袭。

秦始皇任用李斯为相。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 213 年),李斯对过去众多的法规加以整理、修改、充实,编撰出一套比较完备的成文法典——秦律。秦律包括刑法、民法、经济法、行政法、诉讼法、军事法等各个法律门类,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役赋税、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至穿什么鞋都有规定。例如,普通老百姓不准穿丝织有花纹的“锦履”。对于秦朝的法律制度,秦始皇

自我颂扬说，凡事“皆有法式”，莫不“建立法度”。后世汉朝人描述说：“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盐铁论》）这两句话说明，秦代法律比秋天的茅芦类植物荼草还要繁多，刑罚比冻结的油脂还要稠密。

秦朝的法律形式有律、令、法律答问、例等。“律”，是主要法律形式，有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工人程律、均工律、效律等 29 种。“令”，是律的重要补充形式，如田律之外有田令。“法律答问”，是官吏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也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法律形式。“例”，是中央司法机关廷尉运用法律审判案件所确认的成例，也是法律的补充形式。

1975 年 12 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发掘出土秦代竹简 1155 文，其中大部分是法律条文和文书。这批竹简已整理编成《睡虎地秦竹简》一书出版，简称《秦简》。《秦简》虽然远不是《秦律》的全部，但它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唐以前法律条文最多、最早的法律文献，是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秦简》的丰富内容证明秦代莫不“建立法度”，凡事“皆有法式”

的说法是可信的。

5 秦代的严刑酷法

秦始皇推行法家的重刑思想,制定严刑酷法。现有秦律资料中出现的罪名近200种之多。其中有违反王令罪,降敌、誉敌罪,私藏偶语诗书罪,渎职罪,盗窃罪,杀人罪,斗殴、伤害罪,逃亡罪,诈伪罪,不孝罪,乏徭罪,奸情罪等。

秦代立法的主要目的和内容之一,就是维护皇帝的身体、权威和尊严。在这方面稍有触犯便处以极刑。公元前211年(始皇三十六年),天上掉下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案发后,秦始皇派官吏追查,结果没有查出作案的人,竟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史记·始皇本纪》),即把住在陨石旁边的居民都杀光。又有一次,秦始皇去梁山行宫,从山上望见丞相的车骑众多,排场得很,心中不快。随行的太监把此事告诉丞相,丞相很快减少了车骑。秦始皇知道后大怒,把随行的人全杀了。

秦代的刑罚非常残酷,几次“定刑名”。

根据古书记载和《秦简》证明，刑名很多。

死刑有：(1)族刑，即灭绝全族。《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古非今者族。”(2)车裂，即用车分裂肢体，俗称“五马分尸”。《史记·秦本纪》：秦始皇将嫪毐(lào ǎi 烙矮)“车裂以徇”。(3)磔(zhé 哲)，即撕裂活人肢体。(4)腰斩，即将人从腰部斩断。《史记·商君列传》：“不告奸者腰斩。”(5)弃市，即在闹市处死，并暴尸于众。《秦简》：“同母异父相奸，……弃市。”(6)戮，活着先刑辱示众再斩首，叫生戮；先斩首再将尸体示众，叫戮尸。《史记·李斯列传》：秦二世将公子十二人戮死于咸阳市”。《秦简》：“举敌以恐众心者，戮。”(7)定杀，即把犯人抛入水中淹死(适用于患有疾疫者)。《秦简》：“病者有罪，定杀。”(8)梟(xiáo 销)首，斩头后把头悬挂示众。(9)阢(坑)，即活埋。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在咸阳活埋了儒生460余人。(10)具五刑，先执行各种肉刑，再执行死刑。秦二世二年七月，李斯被“具五刑”处死于咸阳。

秦代的肉刑有笞、黥、劓、腓、宫五种。还有两种耻辱刑：耐刑，即剃光犯人鬓发胡

须；髡(kūn 坤)刑，即剃光犯人头头发。这些都是附加刑。

秦代的徒刑有：(1)城旦。是服筑城的苦役(不限于筑城)，适用于男犯。一般为四年刑。附加肉刑称为刑城旦，为五年刑。(2)城旦舂。服舂米以供犯人口粮的苦役。适用于女犯。刑期分四年、五年。(3)鬼薪。男犯服为宗庙砍柴伐薪的苦役，三年刑。(4)白粲(càn 灿)。女犯服为宗庙舂米以供祭祀用的苦役，刑期也是三年。(5)隶臣妾。将犯人及其家属没为官府奴婢，男为隶臣，女为隶妾，往往还有附加刑。(6)司寇。在这里是刑名。男犯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同时防御外寇。女犯也有相似劳役。二年刑。(7)侯，即斥侯。为守边部队充当前哨侦察，是徒刑中最轻的一种。

秦代的流刑有三种：(1)迁，即迁到边远地带。(2)谪(zhé 哲)，即把犯人发配到边远地带，多适用官吏犯罪。(3)削籍，即从户口簿上除名。

秦代有财产刑，叫赀(zī 资)。《秦简》中有“赀一甲”、“赀一盾”、“赀二甲”等一百多处。还有赎刑三种：(1)金赎，即以金钱赎

罪,适用于特权者。(2)货赎,以实物赎罪。(3)役赎,以劳役抵罪。

从秦代的刑罚体系看,其手段非常残酷,死刑种类多,滥用肉刑,不把断足割鼻子当作一回事。《盐铁论》一书中说,在秦代,割下来的鼻子堆成堆,砍下来的脚装满了车。《史记》等书中说,秦始皇时,处宫刑的人多达70多万。秦代还广泛采取诛连,族刑成为法定刑罚制度。严刑酷法的结果,使全国到处都是罪犯。汉代人描述当时情景时说:“赭衣塞路,圜圜成市。”(《汉书·刑法志》)也就是说,道路上充塞穿红色囚服的犯人,监狱遍布全国,关起来的犯人多得像闹市一样拥挤。

6 “上农除末,黔首是富”

秦代奉行法家的力主耕战政策,实行“上农除末”的经济方针。“上农”,是崇尚、奖励农业,以农为本。“除末”,是取消、削弱工商业,以工商业为“末作”、“末业”。秦始皇在《琅玕台刻石》中说:“皇帝之初,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黔首,是当时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称谓。

秦始皇于公元前 216 年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他要求全国有田的人自报占有田地的实际亩数。通过这个清查土地的法令，核实田亩，以便按田亩征税。《秦简》中的《田律》规定，田租按占有的土地多少征收，不论垦植与否，每顷田交饲草“三石”，禾秆“二石”。既然饲草和禾秆都按田亩数征收，以谷物为主的赋税也是这样。“使黔首自实田”是对地主阶级有利的法令，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从法律上承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只要缴纳赋税，就可以不受限制地占有土地。法律上鼓励土地兼并的结果，出现了《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景象。

秦代对农业生产的管现极为重视，在秦律中有很细密的规定，建立了一套严密的农业管理制度和比较科学的管现方法。其中包括农田水利、作物栽培、水旱灾害、风虫病毒、牛马饲养、山林保护、种子保管和使用以及劳动力保证等等内容。例如，《田律》规定，县以下地方官吏要掌握农情，在下雨之后或遇到旱涝等自然灾害，要向上司报告受益或受灾的田地亩数。距离近

的县派“轻足”专程送呈；距离远的县通过驿站传送。《仓律》具体规定各种农作物每亩的种子用量。《厩苑律》规定了发展和奖励牛耕，对耕牛的饲养要定期（正月、四月、七月、十月）进行评比，饲养好的有奖，不好的受罚。《牛羊课》规定，凡成年母牛十头，其中若有六头不生小牛，罚有关人员各一盾。为了保证农业劳动力，《司空律》规定，一家不得同时有二人以上劳役抵罪、赎刑；《成律》规定，不要把一家中的劳动力同时征发去服戍边的徭役，有关官吏若违反这一规定，予以“赀二甲”的处罚。秦代还把周礼中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规定纳入法律中。《田律》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木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木灰，不准采摘刚发芽的植物，或捕捉幼兽、幼鸟，拾取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张网或挖陷阱捕捉鸟兽，这些禁令到七月才解除。同时，还设立专门机构，称作虞部，负责生物保护和环境净化事务。对违反上述规定的，要追究刑事责任。

秦代对官营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也有许多法律规定。例如，秦律规定，凡是有技术

可以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奴隶，不要使他們去做一般杂役。奴隶解放后，可继续当工人。对新工人要进行培养，二年学成，提前学成的有赏，到期没有学成的，要上报主管官吏。《工人程》规定了生产定额，冬天三日收取夏天二日的产品量。因为冬天昼短夜长，古时没有计时器，往往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另外，根据工种、性别、年龄、熟练程度，用不同的折算法计算产量。例如，作杂活的女工二人等于男工匠一人，七岁以上未成年童工五人等于工匠一人；善于刺绣的女工一人等于男工一人。对产品规格、质量也作了统一规定，改变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各类产品规格不一的情况，使产品逐步规范化。

秦朝统治者把工商业与农业对立起来，实行抑制工商业的政策。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认为，“工商众则国贫。”（《荀子·富国》）工商是动乱的根源，必须压制、限制工商业。早在商鞅变法时，就把抑商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商人不得享受完全的人身权利，不许做官，常被剥夺人

身自由，随意征发到戍边罚做苦役。秦始皇把大商人迁离本地，使他们失去根基。例如，从事冶铁的大商人孔氏和卓氏分别迁到南阳和蜀地。在经济上，秦律限制商业的发展，盐铁生产由官府经营，禁止商人从事粮食买卖，堵塞其生财之道；规定商贾(gǔ 古)、开旅店的、赘(zhuì 坠)婿等人，不准立户，不得占有田地，子弟不准做官，甚至将他们送去从军。在封建社会，不准占有田地就等于失去基本财产的所有权。

7 从“约法三章”到汉律六十篇

公元前 206 年，刘邦集团建立了汉朝。商汉（建都长安的西汉和建都洛阳的东汉）400 余年的统治，使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法律制度有明显发展。“汉承秦制”，法律制度上取法于秦，为适合当时政治需要，又有重要兴革，所以汉律对秦律既有继承又有发展。

(1)“约法三章”——汉朝立法的开始

刘邦初入关时，为了宠络人心，打着“为父母除害”的旗号，宣布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其内容很简单：“杀人

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与繁苛的秦法相比，简明易懂，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使刘邦很快建立了关中根据地，战胜了项羽集团，取得全国政权，建立了汉王朝。

（2）萧何制《九章律》

刘邦建立汉朝政权后，面临统治全中国的新形势，三章之法是不够用的，于是他命丞相萧何参考秦律制定律令，韩信定军法，张苍作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开创了汉朝立法的新阶段。

萧何原是沛县小吏，汉代开国功臣。刘邦跟项羽争夺天下，萧何常守关中（即今陕西），征兵运粮，大力支援前线。萧何对封建法律制度的重要性有一定了解和认识，甚至偏爱。有一次，刘邦攻入咸阳城时，将领们争先恐后去抢夺金银财宝，唯有萧何一人跑到秦朝丞相御史의 办公室去收缴秦时的律令图书资料，为新王朝的立法作资料准备。

萧何在秦法的基础上，适应汉初的客观需要，制定了《九章律》。该律在《法经》和《秦律》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的基础

上,新增加了三篇,即户律、兴律和厩律。户律规定户籍、婚姻、赋税;兴律规定征发徭役、城防守卫事项;厩律规定畜牧牛马管理、驿传事项。《九章律》是汉代的重要法典,是汉律的基本组成部分,汉代400余年间,历代虽有增删,但主要内容没有多少变化。

(3) 叔孙通制《傍章律》

叔孙通是一个儒生,先是项羽部属,后带了一百多个儒生,参加了刘邦起义军,任博士官。他懂得朝仪。刘邦为“正君臣之位”,命他制定有关朝廷礼仪的法规。汉惠帝刘盈即位后,任命叔孙通为奉常官,命他制定有关宗庙仪礼的法规。叔孙通制定了《傍章律》十八篇。

《傍章律》对维护朝廷尊严,树立皇帝权威起了重要作用。在未制定《傍章律》以前,刘邦登基称帝,宴请群臣,在宴会上群臣饮酒争功,有的醉得狂呼乱喊,有的拔剑击柱,闹得杯盘狼藉,一蹋糊涂。七年后,有了《傍章律》,情况完全不同了。每当朝会,皇帝御辇一到,百官山呼,依次奉贺,很是威风。公元前200年,为长乐宫建成举行宴

会，群臣前来朝贺。朝贺的仪式按照《傍章律》的规定，设兵张旗，文臣武将排列整齐，进退有序，仪仗威严肃静，群臣不敢喧哗失礼，那些平时骄慢不拘的将领，一个个变得规规矩矩，恭恭敬敬，与前次宴会形成鲜明对比。汉高祖刘邦高兴地说：“今天我才知道当皇帝原来如此尊贵啊！”

(4)《越宫律》的《朝律》

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的昌盛时期之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力渐强。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外征四夷，内兴功利”，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又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加强了立法活动，命张汤作有关宫廷警卫的《越宫律》二十七篇，命赵禹作有关朝见礼仪的《朝律》六篇，以及其他单行律令。这时立法的特点是数量繁多，刑罚严峻。《汉书·刑法志》记载：“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律令文书堆积如山，连司法官吏们都不可能全部看完。“事”，是用来就某些事类作出的弥补律令不足的专门规定；“决事比”，是

比照断案的判例，在律、令没有规定时，可以比照判例定罪量刑。

这样，《九章律》、《傍章律》十八篇、《越宫律》二十七篇、《朝律》六篇，构成了历史上所称《汉律》六十篇。这些律令大都已失传，我们只能从清人沈家本所著《汉律摭遗》和程树德著《汉律考》中略知其中内容。

8 汉代的刑法

汉代统治者把刑法作为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镇压农民反抗的重要工具。

(1) 苛刑酷法，维护皇权

皇帝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任何对皇权的侵犯都被法律规定为最严重的犯罪。汉律中有“不敬罪”和“大不敬罪”，严惩对皇帝不敬的行为。其范围很广，凡是违反诏令、不奉诏、矫诏、阑入宫殿门（擅自进入皇帝居住的地方）、犯蹕（冲撞皇帝出行时的仪仗或车骑。蹕 bì 必）、触讳（触犯帝王的名字）、侵犯皇帝的人身甚至将皇帝使用的弓放在地上，都被认为犯了“不敬罪”或“大不敬罪”，处以重刑。汉律中还有“非所宜言”罪和“腹诽”罪，用来严惩时皇帝不敬

不满的言论和思想。

汉代刑法增加了“阿党”罪和“附益”罪两个罪名，用来限制和打击与中央相对立的王侯国的势力。所谓“阿党”罪，是指诸侯王有罪，辅佐他的下臣不揭发的行为。所谓“附益”罪，是指朝廷的大臣外附地方上的诸侯王的行为。犯了这两种罪都要处以重刑。汉武帝时，淮南王和衡山王犯了这两个罪，被处死的有数万人。汉律还设有“非正”罪（非嫡系正宗继承爵位），“出界”罪（诸侯王擅自越出封国国界），“酎金违律”罪（诸侯在爵祭宗庙时所献贡金不合标准），“事国人过”罪（诸侯王役使其封国吏民超过法定限额），等等，目的在于削弱王侯国割据势力。

(2) 残酷镇压农民，维护汉朝统治

汉朝继承了所谓“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原则，把起义农民诬陷为“盗贼”。凡是以武装反抗的行为，被宣布为“大逆不道”、“谋危社稷”，除本人腰斩处死外，父母、妻子等一律弃市，甚至祖父母也得处刑。

为了孤立农民起义军，割断他们与农

民的联系，汉律规定，凡首谋藏匿起义农民的，定为“首匿罪”，处死刑弃市；凡给农民起义军通情报、当向导、供给饮食的，定为“通行饮食罪”，处死刑。据《汉书》记载，被定为这两个罪处死的有数千人之多。

汉代还专门颁布了两个特别法来惩办对起义农民镇压不力的官吏。一个叫“沈命法”。“沈”同“没”，藏匿的意思，“命”指亡命的“盗贼”。该法规定，如果发生群盗而没有发觉，或者发觉了没有去捕捉，二千石（指享有二千石俸禄的高级官吏）以下都要处死刑。汉武帝时，“盗贼”蜂起，依“沈命法”处死的官吏很多。主管小吏们担心不能及时报案，祸及自己，连累上司，干脆藏匿不报，上司也以同样考虑，纵容下级不要报案，结果上下欺骗，“盗贼”越来越多。另一个特别法叫“见知故纵法”。该法规定，官吏得知别人犯法，特别是“盗贼”，必须举告，不告者与犯人同罪；对应判刑者不判为故纵。这个法令无疑在鼓励官吏宁可错杀也不能错放。但是，无论汉朝统治者采取多么残酷的刑法手段，都无法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

(3) 汉文帝废除肉刑

西汉前期，墨、劓、剕、宫四种肉刑一直沿用，直到汉文帝十三年（公元167年）才被废除，从此开始了封建刑罚制度的改革，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过渡。

《汉书·刑法志》记述了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一段故事。齐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按照法律规定要处肉刑。当他被押往长安时，其幼女淳于缇萦（tí yíng 题迎）跟在囚车后面跑到长安。到长安后，她上书汉文帝，书中说：“我父做官时，人们称他平易廉洁，现在因犯了法要受肉刑处罚。我切痛人死不可复生，刑伤不能再补，即使他改过自新，也毫无办法。我甘愿入身当官奴婢，为父亲赎罪，使他能改过的机会，以便重新做人。”汉文帝看了缇萦的上书，很受感动，叹服她关于肉刑的议论，没有惩罚淳于意，并下令说：“用刑而使人肢体被折新，肌肤被剖削，以致终身受害，既不道德，也不符合我为民父母的本意。”他宣布废除黥、劓、剕三种肉刑，用髡城旦舂（五年劳役徒刑）代替黥刑，用笞三百代替劓刑，用笞五百代替剕左趾，用弃市刑代替剕右趾。宫刑也被废

除了。

汉文帝废除肉刑，决不单纯是受到孝女缇萦言行的感动，而是与汉初整个形势有关。在汉文帝之前，西汉社会经济繁荣兴盛，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社会的繁荣，地主贵族日益奢侈，需要从农民身上剥削更多的财物。这些都要求增加可供剥削的劳动人手，而肉刑使犯罪者失去劳动能力。这是汉文帝废除肉刑的真正原因。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历史上作了肯定的评价。但是，应该看到有改重从轻的一面，也有改轻从重的一面，例如用死刑弃市代替刖右趾便是。从总的来说，废除了从奴隶制起沿袭下来的肉刑，是刑制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

9 儒家思想入律，汉律开始 儒化

中国古代法制史中，法律儒家化是从汉代开始的，历经魏晋南北朝大体完成。汉律儒化有一个过程。

刘邦一生南征北战，靠武力夺得天下。

他重视武力，甚至迷信武力，漠视礼义教化的欺骗作用。建立汉朝政权时，有人主张德治，宣扬行“先王仁义之道”，刘邦没有接受。

到汉文帝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贾谊再次提出“法先王，行仁义”的主张。他劝文帝按儒家“兴礼乐”，改变制度，更新秦朝法律。他对汉律中规定的王侯大臣与平民百姓犯法同样用肉刑不满，上书反复申述古时“刑不上大夫”的道理。他建议，王侯大臣有罪可以革职、赐死，但不能让司寇小吏笞打，这样做会在老百姓面前丢尽王侯的脸，违背“尊尊贵贵”的“礼”。贾谊的这些主张未被采纳，反面受到周勃、灌婴等大臣们的诋毁，说他年少初学不懂事，有擅权欲望。汉文帝把贾谊贬谪到长沙去当地方官。不久，京都发生了错捕周勃的事件，大大帮了贾谊的忙。

周勃是刘邦的同乡，他同刘邦一同起义，南征北战，战功赫赫，是汉朝开国元勋，被封为絳(jiàng 匠)侯。汉高祖刘邦死后，周勃与陈平一起诛灭吕氏，扶立了汉文帝。从汉高祖、惠帝、吕后到文帝，周勃先后被拜

为将军、列侯、太尉、相国、丞相等要职，是四代重臣。到晚年，周勃怕功高位重，有“兔死狗烹”的危险，因而辞官回到封地絳县去居住。不久，有人上书文帝，诬告周勃图谋反叛，因此被捕入狱，受尽狱吏的捉弄、侮辱。后来，周勃用千金收买了狱吏，通过各种关系，请薄太后到文帝那里去说情。汉文帝审核案情，才知是诬告，把周勃放出来，恢复了他的爵邑。四朝重臣周勃被错捕入狱的事件，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议论纷纷。贾谊利用这个事件，再次进谏。汉文帝接受了他的意见，诏令从此以后大臣有罪赐死而不用肉刑。这道诏令成为儒家的礼治思想被输入律令之中的著名例子，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漫长过程。

到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学说，成为汉律的指导思想，在反律有种种表现。例如，汉律开始把“不敬”或“大不敬”罪规定为严重犯罪，以维护皇权，体现“君为臣纲”；以“不孝罪”为重罪，以维护父权，体现“父为子纲”；赋予丈

夫广泛的休妻权,以维护夫权,体现“夫为妻纲”。汉律中渗透礼主刑辅的儒家思想。汉代的《傍章律》、《朝律》,就是专讲君臣之礼。汉律还规定了不同等级各有相应的服饰、居室、车马,以维护贵贱上下之礼。汉代用儒家思想注释法律,使汉律失去本来面目。汉代大儒董仲舒首创以《春秋》经义来审判决狱,使儒家思想成为司法实践的最高原则。

这些事实说明,汉朝统治者已认识到光靠刑法镇压是不够的,这正是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必须采用两手,即礼义教化和刑法镇压来维持专制皇权的统治。

10 汉代的经济法规

汉代封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立法的发展。

汉律严格保护土地所有权。汉代的土地占有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家即皇室占有的“官田”(或称“公田”、“籍田”);另一种是权门豪族、达官贵人等地主占有的“民田”。它们在法律上都得到明确的承认和保护。汉律规定禁止买卖官田,盗卖官田者处

死刑；同时规定民田可以自由买卖，并允许继承，实际上是允许地主掠夺农民土地。于是造成兼并之风盛行，地方割据势力加强，社会矛盾激化，劳动人民被迫反抗。为巩固中央集权，汉武帝时颁布法令，禁止富商兼并和占有土地；汉哀帝时又颁布《占田令》，限制官僚贵族随意占有民田。但这个法令遭到权臣反对，没有真正贯彻执行。

汉代的经济立法贯彻“抑商”政策。汉律贱商人。商贾地位低下。刘邦时，法令规定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吕后、惠帝时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为官吏”。汉景帝时，继续执行时商人“重租税以困辱之”的法令，向商人收取算赋钱，即财产税。凡有资财万钱者，应纳 127 钱，即纳税率为 1.27%。汉景帝还将铸币权收归中央，严禁私人铸钱。汉武帝时颁布法令规定，盗铸金钱的处死刑。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困犯伪造黄金、钱币罪被处死的有数十万人。汉代，从惠帝二年（公元前 193 年）至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 113 年），钱法变了九次，最后由中央政府发行通用全国的五铢钱，统一了币制。同时颁布《算缗（mín 民）令》，向商人、高利贷

者征收财产税,每 2000 钱抽取一算(120 钱);对手工业者,每 4000 钱收取一算。汉武帝还颁布《告缗令》,规定隐瞒财产不报或申报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财产;告发者,赏给应没收财产的一半。中等以上商人大都因此而破产。可见,汉朝利用经济法规对商人打击之严重。

汉朝统治者还直接插手某些商业领域的经营,减少商贾的财源。汉武帝时颁布盐铁专卖法,严禁私人铸铁、煮盐。私自煮制、贩运或买卖食盐的,构或私盐罪,处刖刑。从此以后盐铁由官府管理经营或为制度。

汉武帝还颁布均输平准法,在各郡国设置均输官,在京师设立平准机构,直接经营郡国对中央贡品的运输和一都分官营商业,国家控制市场物价及物资的调运和出售,以防止商人取利。均输平准法或为汉以后各朝经济立法的重要内容。

汉初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当时的税法较轻,“约法省禁,轻田租”,实行什五税一,即用收成的 $1/15$ 交税。汉文帝时,先下令免除农田租税的一半,后实行三十商税一。接着又全部免除农田租税 12 年。人

头税也由每人每年 120 钱减为 40 钱。徭役由每年每人一次，每次一个月减为三年一次，每次一个月。这些措施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到汉武帝时因连年征战，田赋大增，并且巧立名目，有算赋、口赋（即 15 岁以上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出一算）还有户赋（即每户每年出 200 钱）。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

11 秦汉时期的司法制度

秦朝确立封建专制集权统治，皇帝总揽全国一切大权，控制司法机关，对一切重大案件的裁决拥有最后决定权。《汉书·刑法志》记载：秦始皇“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据说他每天要处理简牍文书重达 120 斤。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原来秦国的廷尉制度推行到全国。“廷尉”中的“廷”，有断狱必经朝廷，治狱应当公平的意思；“尉”，原是军官名称，古时兵刑不分。廷尉既是官名，又是机构名。秦王朝极端重视断狱与行刑，廷尉地位提高，成为九卿之一，较前拥有更多的司法权力。它负责审理皇帝交办

的案件和地方上报的重大案件,以及审核判决各郡的疑难案件。

汉承秦制,几乎全盘接受并完善秦朝的廷尉制度。汉代廷尉的地位很高,他“平决诏狱”,直接办理皇帝下诏交办的案件,秉承皇帝旨意断案;又作为地方司法机关的上诉审,凡郡国审判的疑难案件均报廷尉复审平核。廷尉不仅负责审判,还管理监狱,称廷尉狱。汉武帝时在中都洛阳设 26 所监狱,加强封建国家的镇压职能。汉代廷尉以冷酷著称,他们戴的帽子是特制的法冠,叫獬豸冠,象征他们像神兽獬豸那样公正,神圣不可侵犯。廷尉一职往往是父传子,子传孙。东汉时的郭弘就是“数盘皆传法律”,子孙中有七人当过廷尉;吴雄一家三代当廷尉。

在地方,秦代实行行政权和司法权合二而一的制度,由各郡郡守和各县县令兼理。郡县长官拥有审判的批准权,以及重案疑案的上报权。县还设县丞,主管一县司法的具体事务。县以下,在乡一级基层组织设“有秩”和“啬夫”,专理民间一般纠纷。自秦开始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司法制度,加强了

国家的司法统治,并为封建后代的司法组织奠定了基础。从秦代开始,在郡、县分设监狱。汉代有监狱 2000 余所,形成全国的监狱网。汉代,地方司法权力较大。例如,汉朝东海郡有一孝顺的媳妇被诬告谋杀婆母,郡太守不作调查就把她杀了。这个有名的“东海孝妇”的故事后来演变成《窦娥冤》。又如,东汉光武帝时,名噪一时的“强项令”董宣,在北海相(相当于郡守)任内审理公孙丹父子杀人一案,竟判了 30 余人死刑,汉朝廷并没有说他越权,只是责斥他“多杀无辜”。

秦代的诉讼是由当事人向官府起诉,称为“告”。根据案情内容分为“公室告”和“非公室告”。“公室告”是控告贼杀、伤及盗窃他人财物等刑事案件,官府必须受理。“非公室告”是控告家主擅自杀死、刑伤其子及奴婢的案件。这类案件官府不受理,如坚持告诉的,要给予告诉人处罚,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伦理关系。秦朝已规定“诬告反坐”的制度,即对控告不实的人,要用被告人所判处的刑罚反过来处罚告发者。

汉代的起诉叫“告劾”，分自诉和公诉两种。官府接“告劾”后，按犯人的身份分别采取不同的程序。对普通人犯，随时逮捕；对有贵族官僚身份的人犯，如需要逮捕的，必须先奏请皇帝批准，叫“有罪先请”，逮捕后不加刑具，以示宽容。

自秦代起形成严密的“逐级审转复核”的诉讼制度。就是说，从基层县级开始，每一级对案件审理后，凡不属本级权限内的案件，就要呈报上一级审理，层层转报，直到有权作出决断的那一级批准后，该案的判决才生效。这种层层审转使得案件审理层次繁杂，老百姓一旦打起官司，成年累月地走州过府也难以解决。他们称之为“讼累”。这种程序和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秦代对法官判案应负的责任，作出严格规走。法官故意增减犯人应判的罪刑，称为“不直”；故意不判或者减判，以致犯人达不到判罪标准而逃脱法律制裁的，叫“纵囚”。“不直”和“纵囚”都作为重罪追究法官的法律责任。汉代基本沿袭了这个规走。在汉代，如果有冤狱，可以逐级上书皇帝，这叫“诣阙(yì què 易确)告诉”。

秦、汉律都规定，根据犯人口供进行判决。认为口供是主要的证据。为了取得口供，可以使用刑讯。秦代初期，只是在犯人理屈词穷，拒不认罪时，才可拷打，而且要把刑讯的理由和执行人的姓名在“爰书”（yuán 元；古代司法文书）上写明。到秦二世时，赵高专权，刑讯用得更多更残酷了。例如，“李斯案”就是用严刑拷打而炮制的著名冤案。李斯是当朝丞相，赵高诬告他谋反，关在狱中。在千余次拷掠下，李斯屈打成招，被处死刑。汉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年）颁布《箠令》，规定了刑具及执行方法，改用竹制的箠，长五尺，本身粗一寸，末梢薄半寸，竹节削平，在臀部用刑，行刑者不得更换。从此，受刑讯的人才得保全生命。

秦代尊崇法家，强调“依法治国”，严格规定法官依律断案，违者治罪。从汉代开始，封建法律儒家化，采用《春秋》决狱。《春秋》是孔子修订的一部鲁国编年史。汉儒董仲舒认为，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在于讨伐乱臣贼子，宣扬“礼义之大宗”。随着汉律儒家化，董仲舒等人把儒家思想引到司法实践

中去，以《春秋》的经义来断案决狱。也就是说，用礼义学说作为判断是非、善恶以及贤、不肖的标准，作为审判案件的根据。这样做可以抛开肯定明确的法律条文，用儒家的礼义学说任意解释人们的行为是否犯罪和应该受到何种处罚。当时，以《春秋》决狱之风盛行。董仲舒已不在朝廷做官了，朝廷有重大案件还派廷尉张汤到他家中去请教。于是，董仲舒著有《春秋决狱》一书，共有 232 事例，又称《春秋决事比》。

三 定 型 篇

——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隋朝和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隋唐的法律制度达到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隋律上承汉律的渊源，下开唐律的先河，具有重要地位。唐律体系严整，内容丰富详备，荟萃历代律典的精华，是中国封建时代一部成熟的法典。隋、唐法制是中国古代法制发展史的定型阶段。

1 隋文帝与《开皇律》

公元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夺得政权，建立了隋王朝，称隋文帝，改元开皇，建都长安。杨坚曾在北周从政多年，亲眼看见严刑酷法的弊病。他当皇帝后采纳了刑部侍郎赵绰(chāo 超)提出的“行尧舜之道，多存宽宥”即实行轻刑恤罚的建议，定为立法的指导原则。

开皇元年，隋文帝适应时势要求，继承

了“法令明审，科条简要”的传统，制定了《开皇律》。《开皇律》删去死罪 81 条，流罪 154 条，徒、杖等罪 1000 多条，留下 500 条，共 12 篇。《开皇律》是自秦以来历代法律中比较轻简的法律。唐朝及以后各朝的法律，在篇章体例上都沿用《开皇律》，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开皇律》的修成是中国古代法制史的重大转折，它使古代法制定型化。表现在：（1）篇目定型。起初《法经》六篇，后来《汉律》60 篇，魏晋南北朝各代法律篇目或多或少，变动不定。到隋《开皇律》定为 12 篇后，为唐、宋、明各代所承袭沿用。（2）刑名定型。秦律中的刑名繁杂，以后几代发生变化，趋向简化，到《开皇律》时定型在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上，除辽代外，一直沿用到清代，基本没有多大变化。（3）确定“十恶大罪”的罪名，自唐至清一直沿袭来改。（4）规定的“八议”、“官当”制度也为后世法制所仿效。总之，《开皇律》起着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从此长达 1200 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封建法制基本上定型化。隋文帝制定《开皇律》的史迹是不可磨灭的。

隋文帝不仅制定较轻简的法律，而且他统治时期的司法官吏比较重视法制。有两件事能说明这一点。

刑部侍郎辛亶(dǎn 疸)，好穿红色短脚袜，他认为这样能官运亨通。隋文帝则认为辛亶犯了“厌蛊”罪，下令斩首。刑部侍郎赵绰进谏说，根据《开皇律》规定，犯“厌蛊”罪不应当处死，臣不敢奉诏。隋文帝发怒说，“你惜辛亶的命，却不惜自己的命！”并命令左仆射高颍(jiǒng 窘)去斩赵绰。赵绰又辩解说：“陛下宁可杀臣，不能杀辛亶。”说完就走下朝堂，解开衣服，等待斩首。隋文帝派人问他有无悔意，他回答说：“执法一心，不敢惜死。”隋文帝听后觉得有道理，第二天嘉奖了他，赐给他绸缎 300 匹。

又有一次，有两个人在市上用品质差的钱换好钱，巡察士兵逮捕上报，隋文帝下令杀两个犯了钱法的人。赵绰进谏说：“依照法律这两个人不應該处死，应当处杖刑。”隋文帝说：“这不关你的事。”赵绰说：“陛下把我安置在法司工作，理在要不依法处人死刑，怎能说不关臣的事？”隋文帝又说：“捕晃不动大树的，应有自知之明，应当

避开”！赵绰回答说：“臣希望感动天子的心，哪里是什么摇晃大树！”隋文帝又说：“喝热羹的，太烫了得放一放，天子的威严，你打算加以挫伤吗？”赵绰听后，跪拜前行，皇帝叱责制止他，也不肯退下，于是皇帝入宫去了。后来，另外一位大臣又上奏章谏劝。隋文帝有感于赵绰的“诚直之心”，收回成命。后来，隋文帝常把赵绰召入内房赐坐，评论政事得失。

上述两件事说明，刑部侍郎赵绰信守法制，“执法公允”，也说明隋文帝在开皇前期能够纳谏，重视法制，才使得《开皇律》发挥重要作用。可惜，隋文帝晚年废法，法外用刑，冤狱遍地。后来，隋炀帝继位，虽然颁布了比《开皇律》还宽大的《大业律》18卷和《大业令》30卷，但是他横暴残忍，荒淫无度，恢复被废除了的轘、裂、枭首等残酷刑罚，设立严刑，把族刑由株连二族发展到株连九族，终于导致“百姓怨嗟，天下大溃”（《隋书·刑法典》，为唐所灭。

2 封建法典的楷模——唐律

公元618年，以李渊父子为首的关陇

贵族官僚集团，夺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了唐朝。李唐王朝从建立到灭亡（公元907年）的289年间，积极进行立法活动，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1）唐高祖与《武德律》

公元619年，武德二年，唐高祖诏令刘文静等人，参照《开皇律》，撰成《武德律》12篇。此外还有《武德令》31卷，《新格》53条，《武德式》15卷。由于唐王朝此时刚刚建立，来不及大规模创立法制，因此这些律令与《开皇律》基本相同。

（2）唐太宗与《贞观律》

公元626年，李渊次子李世民即帝位，称唐太宗，改元贞观。唐太宗任贵纳谏，励精图治，比较重视法制，于贞观元年诏令长孙无忌等人修改《武德律》，历经10年，撰成《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但刑罚略有减轻，律条比较完备。此外，还有《贞观令》30卷，《贞观格》18卷，《贞观式》20卷。唐太宗不但为唐代立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为他励精图治立下了准绳。

（3）唐高宗与《永徽律疏》

公元650年，唐高宗李治即位，改元永

徽。这时，唐朝封建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恢复和发展，已经达到全盛时期。唐高宗下诏命长孙无忌等人，以《武德律》、《贞观律》为蓝本，制定《永徽律》12 篇，于第二年颁行。还有《永徽令》30 卷，《永徽格》17 卷，《永徽式》14 卷。

唐朝统治者为了确保法律适用的统一，使执法官吏懂得每条法律的精确含义，发挥法律的效能，命长孙无忌等人依据《永徽律》的精神，逐篇、逐条、逐句地进行详细的解释，于永徽四年颁行疏议，连同律文，这就是《永徽律疏》，后世称为《唐律疏议》，共 30 卷。疏议与律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都可以引用断案决狱。

《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时代保存下来最早最完备的法典，是秦汉以来封建法律的结晶，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极盛时期的政治经济特点，文字简明扼要，注疏确切全面，不仅被后世奉为立法楷模，而且推动了封建法学的发展，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立法都有深刻影响。

现存《唐律疏议》共有 12 篇：（一）名例篇，关于刑罚的种类及其适用的一般原则

的规定；(二)卫禁篇，关于警卫宫廷和守卫关津的规定；(三)职制篇，关于官吏职务和惩治官吏违法失职的规定；(四)户婚篇，关于户籍、田宅、赋役和婚姻家庭的规定；(五)厩库篇，关于国有牲畜、仓库管理的规定；(六)擅兴篇，关于兵士征集、军队调动及兴造的规定；(七)贼盗篇，关于保护封建政权和地主阶级人身财产不受侵犯的规定；(八)斗讼篇，关于斗殴伤人和控告、申诉等的规定；(九)诈伪篇，关于欺诈和伪造的规定；(十)杂律篇，关于不能编入其他篇的犯罪的规定；(十一)捕亡篇，关于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规定；(十二)断狱篇，关于司法审判和监狱管理的规定。

(4)唐玄宗与《开元律》

公元737年，唐玄宗在《永徽律》的基础上修订了《开元律》，内容与《永徽律》基本相同。此外，还有《开元令》30卷，《开元前格》10卷，《开元后格》10卷，《开元卷》20卷。

(5)《唐六典》——中国古代第一部行政法典

公元722年，唐玄宗修成《大唐六典》

30卷，这是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所谓“六典”，是周朝《周官》中所设的现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但唐代官制与周代官制大不相同，实际上是按照国家机关体系进行编纂的。它以三师、三公、三省、九寺、五监、十二卫等为目，详尽规定各部门的机构设置、官员编制、职掌权限、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官吏任用等一系列制度，相当于封建国家的组织法。从先秦到唐初，中国的法典基本上是刑法典。《唐六典》的修成、颁布，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制史在内容和形式上有重要发展，出现了行政法典。它是唐代立法活动的一个卓越成就，而且对后世行政立法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纵观唐代立法，《武德律》、《贞观律》、《永徽律》、《开元律》、《唐六典》，构成了唐律的基本内容，它与前朝《魏律》、《晋律》、《北齐律》有渊源关系，直接沿用了隋《开皇律》，是历代法律不断改进的结晶，是历代封建法典的集大成者。唐以后的历代法律大多保存下来，把《宋刑统》、《大元通制》、《元典章》、《明律集解附例》、《大清律例》，

分别与《唐律》比较,可以看出,虽然后世各朝的法律各有其时代特点,但篇目的繁简,律条的内容和体式,量刑的轻重,都是由《唐律》一脉相承下来的。

唐代法典形式规定为律、令、格、式四种。“律”是“正刑定罪”,规定处理刑事犯罪的法律条文。“令”是“设范立制”,规定国家制度的单行条例,可作为律的补充。“格”是“禁违止邪,百官所常行之事”,即皇帝临时对国家机关所颁发的各种指示,作为令的补充。“式”是“轨物程序”,关于国家机关的办事细则、公文程式以及百官权责的规定。这些律令格式,涉及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社会生活的一切主要方面。它不仅规范详备,而且科条简约,概念明确,用语简练。国外一些法学家认为,唐律可以与罗马法媲美,它在东亚法制史上的地位与罗马法在西方法制史上的地位相似。尤其对日本、朝鲜、越南有重大影响。

3 隋唐时期的刑法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刑法进一步发展,全面规定了侵犯封建统治的各种犯罪,改

革刑罚制度,刑罚方法逐渐简化、宽缓,封建的五刑形成和最后确立。这个时期的刑法有其突出的特点。

(1)“十恶大罪”的确定

“十恶大罪”是封建法律中规定的不可赦免的十种罪名,称“十恶不赦”。隋《开皇律》正式确定十恶的罪名,唐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十恶大罪”包括:(一)谋反,是反对以专制君主为代表的封建国家统治的行为;(二)谋大逆,指毁坏宗庙、山陵及宫阙的行为;(三)谋叛,主要是本朝官吏背叛朝廷,投奔外国或投降藩国的行为;(四)恶逆,指殴打或谋杀尊亲属的行为;(五)不道,指杀死本无死罪的人或杀人后肢解尸体的行为;(六)大不敬,指对皇帝的人身和尊严有所侵犯的行为,包括盗窃祭神物品、供品,皇帝衣物用具、玺、符等;(七)不孝,指子女不善事父母的行为;(八)不睦,指亲族之间互相侵犯的行为,如谋杀亲族的人,卑幼对尊长有殴打或控告的行为;(九)不义,指下官杀死上司,学生杀死老师,妻子闻丈夫死亡后隐匿不举行哀悼或寻欢作乐、穿吉服、

改嫁等行为；(十)内乱，指亲属相奸的行为。

“十恶大罪”被认为是“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的极端严重的犯罪行为，被放在唐律的篇首。所谓“毁裂冠冕”，是指侵犯作为封建统治阶级最高代表的皇帝，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教四个罪，都属于这方面。“亏损名教”，是指侵犯父母尊长，破坏封建伦理道德关系，恶逆、不道、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六个罪，都属于这方面。这两句话说明了确定十恶大罪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政权和封建统治秩序。

(2) 其他犯罪的规定中的明显特点

唐律规定有杀人罪和伤人罪，把杀人罪分为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和合谋杀人；把伤人罪分为故意伤害、过失伤害和共同伤害，并根据不同情节分别处刑。

隋律中对盗窃罪处刑非常严厉。隋文帝下令盗一钱以上者处弃市之刑，盗边粮一升以上皆斩，并籍没其家。后来，到隋炀帝时刑罚更严，盗窃者不论罪行轻重，一律斩首。

唐律中把盗分为窃盗、强盗和监守盗

三种。窃盗是潜形隐面窃取他人财物；强盗是以暴力威胁他人而取得财物；监守盗是官吏利用职务便利条件去盗取财物。其中强盗罪被认为是最危险的犯罪，即使没有盗取到财物也要处死刑。

唐律还规定一些经济犯罪，如严禁杀牛马，违者处徒刑一年；对官有牲畜饲养不得法以致死亡的，也要处刑；私自出借官物，以盗论；对库藏物品保管不善而损坏的，以赃论，等等。此外，还规定破坏市场罪，私造度量衡不合规格，主管市场的官吏评价不公，操纵市场故意提高或降低物价等行为，都要处以笞刑或杖刑。

(3) 确定封建五刑制

隋唐时期，对刑罚制度进行改革。隋文帝废除了鞭刑、宫刑、辕刑、枭首、孥戮、连坐等酷刑，确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这是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以来对刑罚制度的又一次重要改革。唐代的刑罚进一步定型化，详列了五刑的等级。隋唐的刑制改革，反映中国封建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高。

笞刑，是用竹板或荆条击打罪犯的背

脊、臀、腿部的一种刑罚，是五刑中最轻的一种刑罚，主要用于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隋唐的笞刑分五等，从10至50，每等加十。

杖刑，是用大于笞刑所用的竹板或荆条捶击罪犯的背、臀、腿部的刑罚，比笞刑稍重。杖刑常使受刑人致死，唐初对杖刑的部位加以限制，规定所用刑具“常行杖”，长三尺五寸，皆削去其节，大头二分七厘，小头一分七厘。隋唐律规定杖刑分五等，从60至100，每等加十。

徒刑，是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人的自由并强迫其劳役的一种刑罚。隋唐律中的徒刑分五等，从一年至三年，每等加半年。

流刑，是将罪犯遣送到边远地区去服劳役，不许擅自迁回原籍的一种刑罚。隋朝的流刑分三等，即流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三千里，称为“三流”。唐朝的流刑也分三等，但每等比隋三流多一千里。被判处流刑的罪犯，还要附加“居作”，即在配所内服劳役。流刑重于徒刑，而轻于死刑。

死刑，是剥夺罪犯的生命，古时称为大辟，是最重的刑罚。隋、唐律中只规定绞、斩

两种处刑方法,比以前各朝简明。

(4)减免官僚贵族刑罚的特权制

封建法是特权法,公然在法律里规定人们在法律面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八议”制度上。“八议”制度,是指统治阶级上层人士中八种有特权身份的人犯了罪,可以经过特别审议并享受减免刑罚的特权制度。源出自西周的“八辟”,即八种享有特权的人单有一种法制,他们犯了法不能随便处置,先“议”后依法处罚。如何“议”法,当时没有规定。从春秋战国到秦朝,法家得势,强调“法不阿贵”,“一断于法”,“八辟”原则遭冷落。汉武帝推崇儒术,八议逐渐进入法制,对县令以上官员,实行“有罪先请”的制度。但这对八议尚未系统化,也没有普遍实行。三国时魏明帝制定《新律》,第一次把“八议”载入律文中,随后,两晋南北朝和隋唐至宋元明清的律文中都有规定。

唐律规定适用“八议”的对象是:(一)议亲,即皇亲国戚;(二)议故,即长期侍奉过皇帝的故旧;(三)议贤,即有封建大德行,为人楷模的“贤人君子”;(四)议能,治

国治军有才干的人；（五）议功，为封建王朝建立过大功勋的人；（六）议贵，封建官僚和贵族，一般指三品以上官；（七）议勤，为封建国家历经艰险，服务勋劳的人；（八）议宾，前朝贵族。

唐律规定，以上皇亲国戚，贵族官僚，符合八议对象的，按其亲疏等级分别享有议、请、减、赎、当、免等一系列特权。

所谓“议”，指以上八种人犯了除十恶大罪以外的其他罪，应判流刑以下的，减一等；应判死罪的，将其所犯罪行及应议的理由奏明皇帝，皇帝再交下都堂集议，议定后奏上，由皇帝从轻裁决，一般司法官无权过问。

所谓“请”，指八议对象中一定范围的亲属，犯死罪者奏请皇帝裁决，犯流罪以下减一等。“请”和“议”不同，“议”的对象是八议人自身，而“请”的对象是八议人的亲属，所以对请者的限制较议更严。

所谓“减”，指七品以上官吏和五品以上官爵应“请”者的亲属，犯流罪以下可减一等处刑，死罪例外。

所谓“赎”，即用铜赎罪。适用三种人，

一是享有议、请、减特权的人；二是九品以上官吏，三是七品以上官一定范围的家属。这三种人犯流罪以下的可以用铜赎罪。实际上，死罪也可以赎。唐律明文规定死罪不分绞斩，赎铜 120 斤。

所谓“当”，或称“官当”，即用官品等级来抵消刑罚，适用于一般官吏。唐律规定，五品以上，一官可当徒“私罪”二年，“公罪”三年；九品以上，一官可当徒“私罪”一年，“公罪”二年。唐律把罪分为“公罪”和“私罪”，“公罪”指官吏因公事致罪，“私罪”指官吏因私事犯罪。“公罪”多出于过失，“私罪”多出于故意。所以，“私罪”从重，“公罪”从轻。

所谓“免”，是用免去官爵的办法来比作徒罪。免官比徒有三种形式：一是除去官爵名，比徒三年；二是免官不除名，比徒二年；三是免去现任官职，比徒一年。

4 中国封建制民法的雏形

民法是调整一定范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我国古代有关钱债、田土、户婚等民事性质的法律规范，都包括在诸

法合体、内容庞杂的统一法典之中。秦汉时期已有买卖契约、租佃契约、借贷契约。到隋唐时期，律文中的民法规范多了起来。唐律中有关于物权法、债权法和继承法的规定，这是中国封建制民法的雏形。

(1) 物权法

物，在现代民法中分动产和不动产。中国封建法律有类似的概念。动产称为“物”或“财物”、“资财”，其所有者称为“财主”或“物主”。不动产称为“产”或“业”、“产业”，其所有者称为“业主”或“产主”。唐以后历朝法典及有关材料，关于物权的分类，可概括为所有权、佃权、典权和质权等。

所有权是指所有人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能。封建法典中有不少关于保护所有权的规定。对动产所有权的侵犯，构成盗窃罪，要受到严厉惩罚。对不动产的侵犯，如唐律中规定的“盗耕种公私田”、“妄认盗卖公私田”、“在官侵夺私田”、“盗耕人墓田”等侵权行为，分别以“妄认罪”、“盗卖罪”论处。在这里也表明封建法典中民刑不分的特点。

唐律中已有无主物的占有、埋藏物的

发现、漂流物与遗拾物的处理、孳(zī 资)息物的归属等具体规定。

佃权,是佃权人(佃农)支付地租,占有出租人(地主)的土地而进行耕种收益的权利。从发现的敦煌唐代文书中可知当时已保护佃权。

质权,是债权人因担保债权,占有债务人或第三人移交的财产,就其卖得的价款优先接受清偿的权利。唐代的质权,即近代通移的“当”或“典当”也已产生。寺院的典库,称为“长生库”或“无尽库”,质钱取利。当主所出贷的钱,称为“当本钱”或称“当价”、“典价”。当铺确定当物回赎的期限,逾期不赎,当主取得当物的所有权。

典权,是典权人支付典价,占有出典人的不动产,而加以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它萌发于唐代,当时已有“典质良田数顷”的事例(《旧唐书·卢群列传》)。

(2) 债

唐代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契约形式比秦汉隋时期更多了。唐律中出现了租佃、买卖、债务等契约形式,以及有关债务担保、时效、损害赔偿等一系列规定。

中国古代的“债”与“责”通用。债务人称“债人”或“责人”；债权人称“债主”、“责主”或“钱主”；债务，称“欠负于人”；债权，称“求索于人”；不履行债务，称“违负”或“不偿”；清偿债务，称“偿”或“还”。唐律规定，债务人要承担给付责任，先以“财产负责”，其次以“人身折酬”，如违约不偿，债主可以“牵制”其财并告官。官府可以“强制执行”。“财产负责”，是债务人以特定财产作债务担保，如以动产作为质权或以不动产作为典权就是。“人身折酬”，是债务人资财耗尽，无力偿债时，债主可以要求债务人及其家中男子以劳役偿还。“牵制”，是当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债务人强制扣押债务人的财物。“强制执行”，是官府对负债不还的债务人的处罚。

(3) 继承法

中国封建继承法，包括宗祧继承、财产继承和封爵继承三种。

宗祧继承，是依照男性血统来继续家族的脉系，承宗接代。继承人负有领导家族、祭奠祖先、守丧父母、教育子弟、传宗接代的责任。因此，在这种继承制度中，继承

人与被继承人相互间的血缘与辈份关系极为重要,所以首先限于嫡长子继承。如果嫡长于早死或有疾病,由嫡长孙继承。没有嫡长于或嫡长孙才可以立庶子代替。

财产继承,是实行以儿子人数子均分配财产的制度。这种制度体现了大家庭内互相扶贫均富,有无与共,兄弟间和睦共处的儒家精神。唐律规定,应分的田宅房屋,兄弟均分;兄弟死亡的,由其子承父参加分配。为了争继承财产而打官司,被认为违背礼教的行为,受到谴责甚至处罚。

封爵继承,是唐代确立的一种继承制度。封爵,是皇帝或国王授与宗室及勋臣的荣典。而周时,官爵由历代大宗嫡长于继承,战国时各国破格推用人才,打破了世家世业的局面。汉代以后,荫袭制度依然存在,但不一定是嫡长子继承。到唐代才重新确立嫡长子封爵继承制度。唐律严格保护嫡长于继承官爵的权利。如果不是嫡长于承袭官爵的,处二年徒刑;非子孙诈承官爵者,处徒刑三年。

5 中国封建婚姻家庭制度

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核心是夫权、族权(包括父权),它完全是为了传宗接代、祭祀祖先,所以它以家族为中心,而不是以个人意愿为准。婚姻的成立完全排除子女的意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封建婚姻的合法形式。父母、祖父母等尊亲属对家中卑幼依法享有主婚权。男女青年自定终身,被看作是伤风败俗,玷辱门庭的丑事,不仅要受到责罚,还得被迫离散。“为婚之法,必有行媒”的习俗,在东周时便有,到唐代已成为法律制度,违反法律的嫁娶,媒妁也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

封建的礼法对结婚有种种限制:一是同姓不婚。唐律规定,同姓为婚者,各判徒刑二年,宋明清各代也承袭这个规定。二是亲属不得为婚。三是良贱不得通婚,奴娶良人为妻,徒一年,女家减一等,并强迫离异,主人知情杖一百。此外,还有尊卑不婚、宗妻不婚、奸逃不婚、居尊亲丧不得嫁娶、妻居夫丧不满不得再嫁、父母被囚禁时不得再嫁,等等规定。

封建婚姻的成立有两个主要条件：一是门当户对。不同阶级和等级之间的男女是禁止通婚的。例如，唐律规定，奴婢私嫁良人为妻者，准盗论。即使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有很深的门第观念，门不当户不对不得通婚。二是财产多寡。封建社会实行聘娶婚，交付聘礼或聘金后，婚姻才算成立，实际上这是买卖婚姻。

封建法律在离婚问题上对夫妻有极不平等的要求和规定。唐代，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是“出妻”，或叫“休妻”。这是法定的最主要的离婚形式。唐律沿用汉律的“七去三不去”（或叫“七出三不出”）的规定，凡是妻子有下列七种情况之一者，丈夫有权离弃她。这七种情况是：不事公婆、无子、淫、妬、有恶疾、多言、盗窃。这七条除盗窃一条关系本人品德外，其它六条都与家族利害有关。例如，无子便不能传宗接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这个意思。又如，不事公婆这条，没有客观标准，全看公婆高兴。丈夫为了尽父母的孝心，为了一点小事也可以休妻。南北朝时刘谡的妻子王氏，在墙上钻孔挂脚，不慎让墙土落到婆婆孔氏

的床上，孔氏不悦，刘讖立即休了妻。南宋时的陆游和妻子唐婉，也是“七出”制度下的牺牲品。所谓“三不去”，是下列三种情况下不能休妻：坚持舅姑之丧，娶时贱后贵，有所取无所归，女方无娘家可归。另一种离婚形式是“义绝”。丈夫对妻子的家族，或者妻子对丈夫的家族，犯有殴杀、奸非、谋害等犯罪行为，被认为夫妻情义绝裂，构成当然的离婚条件，不论夫妻双方本意如何，都必须离婚。第三种离婚形式是“和离”，相当于近代的协议离婚。无论哪一种离婚形式，妇女单方绝无离婚的自由。女方提出离婚被认为违背纲常、有乖妇道的事，根本不能为社会所容忍。做妻子的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即使受到丈夫及其家人虐待，也只能忍受。

封建家庭是家长专制，一家之内，子必从父，弟必从兄，妻必从夫，全家都必须服从家长。家长由家庭中辈份最尊的男性担任。

封建法律规定卑幼对尊长负有种种义务，其中主要是扶养义务。不尽义务为“不孝”，而不孝是“十恶大罪”之一，要受到最

严厉的刑罚制裁。夫与妻的关系也是尊与卑的关系,妻子必须从属丈夫,如果妻子控告丈夫,是“干名犯义”的犯罪行为。名指名份,义指情义,“干名犯义”罪是封建法律对卑幼控告尊长的行为规定的一种罪名。

6 唐代的经济立法

在唐代,从贞观到开元年间,经济繁荣,文化灿烂,国力强盛,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杜甫在《忆昔》一首诗里描绘了当时的景象:“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lǐn 凛)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wān 弯)鲁缟(gǎo 稿)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这种情况与隋末“万户城廓空虚,千里烟火断灭”的惨状,形成鲜明对照。这一巨大变化,与唐代经济立法的作用,有密切关系。

(1) 均田法

唐高祖为了恢复残破的经济,满足征收赋税和兵役的需要,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制定了均田法。该法规定,18岁以上男丁,由国家授给田一顷(100亩),其中

2/10(20 亩)为永业田, 8/10(80 亩)为口分田。老男、残疾人给田 40 亩, 寡妻、妾给田 30 亩。如果是户主, 加给 20 亩。永业田归受田人私有, 死后传给继承人。在一定条件下(如迁徙到荒僻边远地区)可以把田地卖掉。口分田为国家所有, 不许买卖, 受田人死亡, 由官府收回, 另行分配。

均田法不仅使小土地私有制得以形成, 保证了农民的生活资料, 也保证了地主的剥削收入。唐律还规定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 禁止买卖转让, 禁止兼并土地, 禁止土地荒芜, 违者要受到刑罚制裁。

(2) 租庸调法

唐高祖武德七年, 在颁布均田法的同时, 还颁布了租庸调法。租, 是按丁缴纳的田租, 即地亩税; 庸, 即徭役, 不服力役时, 可缴纳一定的实物庸替, 也叫“输庸代役”; 调, 是户调, 按丁缴纳一定的织物和棉麻。这种新法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 将地租与徭役合一的赋役制度。该法规定, 租, 每丁每年纳粟二石或稻三石; 调, 随乡土所产, 蚕乡每丁每年纳綾或绢、绝(shī 施)二丈, 绵三两, 非蚕乡纳布二丈五尺, 麻三斤; 庸,

每丁每年服役 20 日，闰月加二日，如不服役，每日纳庸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违反规定的，处笞刑 40 直至死刑。但是，租庸调的承担者（在政府不急需劳力的情况下）可以纳绢布代替劳役，农民得以有较多时间参加生产。这个新法令比隋炀帝时的横征暴敛大大减轻丁，农民能够生活下去，封建国家和地主对农民的人身控制也有所减轻，社会经济渐渐复苏。

(3) 两税法

唐中叶，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瓦解，租庸调法失去存在的基础。为了解决财政危机，维持唐王朝的赋税收入，防止人民起来反抗，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 780 年），在著名封建政治家、宰相杨炎建议和主持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是封建税制的一种新形态，它是以劳力、土地和财产的多少来确定纳税的等级，不再分地租和力役，合诸税为一税，统一征收，税额多少，与男丁多少已没有联系。“两税”，包括地税和户税。地税，即田亩税，按亩纳来麦；户税，即资产税，按户等高低定税钱。官府按贫富把居民分为

九等户，具体规定每个户等的税额。虽仍以实物计征，但要折合为钱帛，主要征收货币。两税法规定全年分夏、秋两次摊征。所谓摊征，是指没有固定税率，征收总额由朝廷依据需要分摊给各州县。没有固定居住地的行商，一律在所在州县，缴纳资产1/30（后改为1/10）的税。

两税法是剥削农民的新形式。中唐时期诗人柳宗元在《田家》一诗中发出了“蚕丝尽输税，机杼（róu 柔）空倚壁”的感叹！元慎在《田家词》中写道：“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晚唐诗人聂夷中在《田家》诗中也写道：“父耕原上田，子创山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仓。”这几首诗词说明当时农民蚕丝已全部纳租税，织布机空空地倚靠在墙边，农民不得已变卖房屋家产去交纳租税，而官府对农民的痛苦毫不关心，稻谷还没有扬花，就已在修理仓库，准备征收租税了。

新税法也反映了封建官府对农民人身控制有所松弛，使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自从战国以来通行的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转变为榨取实物为主的新的

赋税形态,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

7 唐代的司法制度

唐代不论是司法机关还是诉讼制度,都比以前更为完备了。

(1)“三司”和“三司推事”

唐代的司法机关,在中央设立了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三位一体的司法系统,简称“三司”。大理寺是最高审判机关,其长官叫大理寺卿,副职叫少卿,属吏有大理正、大理丞等,负责审理中央百官和京都徒罪以上案件,复审地方上报的死罪疑案,对徒罪、流罪案件的判决必须送刑部复核,对死罪案件的判决要报请皇帝批准。

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机关,其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属吏称郎中,负责复核大理寺推来的流罪以下及州(府)县徒罪以上案件。在复核中,如有疑点,对徒流以下案件可驳令原审机关重审,或者自行复判;对死罪案件可转交大理寺重审,上奏皇帝批准。

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掌有司法监

督权,其长官称御史大夫,副职为御史中丞,属下有若干御史,负责监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审判活动,遇有大案也参与审判,并受理行政诉讼案件。

三司都遵照皇帝命令,统掌法制政令。它们都有审判职能。凡遇到特别重大案件,由大理寺卿会同刑部尚书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这叫“三司推事”。“三司”之间互相配合,又互相监督,这种制度加强了皇帝对中央司法机关的控制,比秦汉以来的司法制度更加严密和完备。

唐代出现了一些执法不阿的司法官吏。史书记载,唐太宗时的大理少卿戴胄,高宗时的大理丞狄仁杰,武后时的司刑丞徐有功,玄宗时大理寺卿李朝隐等,都敢于向皇帝直谏,纠正皇帝不依法断罪的错误。

(2) 诉讼制度

在唐代,由官吏代表国家纠举犯罪的,称为“举劾”(hé 核)。上司对下属犯罪不举劾的,要治罪。唐律规定,对一些重大犯罪,强制人人有告发的责任,家属也不例外。知情者不告发,也要治罪。举劾和告发都是起诉的形式。

起诉的另一种形式是告诉。唐律对平民告诉有种种限制。例如，除谋反、谋叛、大逆等重大犯罪外，对其他一般犯罪，卑幼和卑贱不得控告其尊长和尊贵。在押犯人，年龄80岁以上、10岁以下的人，笃疾者（患不治之症），一般无控告权。唐代，复审制度日趋完备。有重大冤屈的，除继承晋代以来“击登闻鼓”直诉皇帝，要求复审外，还增加了“邀车驾”（即乘皇帝外出车驾经过时允许拦路喊冤），上表皇帝申诉冤情。但申诉不实，要给予法律制裁。关于死刑复核，隋朝规定三复奏制度；唐朝到唐太宗时，规定京师实行五复奏，地方实行三复奏。

唐代的审讯以众证定罪，口供是判决的主要证据，所谓“罪从供定”。唐代的证人证言制度，对证人出庭作证作了严格规定，凡80岁以上、10岁以下以及患有不治之症的笃疾者，缺乏作证能力，不得作证；唐律强调“亲亲相隐”的礼教原则，凡是犯人亲属不得要他们作证；唐代实行“众证定罪”原则，要三人以上证人作证才能定罪，所谓“三人证实，二人证虚。”为了取得口供和证言，唐律允许对被告和证人使用刑讯

手段。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一直确认刑讯制度的合法性。唐朝则进一步将刑讯制度化了。唐律规定刑讯以前，司法官必须立下文书，并要得到现任长官的同意。拷讯每隔20日进行一次，拷打三次为止，总共不得超过200杖；对享有议请减免等特权的贵族官僚，年70岁以上、15岁以下及残疾者，不得进行拷讯。违反上述规定的司法官要受到刑事处罚。

实际上，上述法律限制很少有约束力，唐代的拷打刑讯的运用是很普遍的。史书记载“请君入瓮”的故事：武则天统治时期，任用周兴、来俊臣等人主管司法审判工作。他们编著《告密罗织经》，专门训练特务，传授诬告陷害的经验。他们经常使用惨无人道的刑讯手段，枉杀正直的大臣和无辜的群众，据说惨死在周兴手下的就有几千人。武后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有人告发周兴和丘神绩共同谋反，武则天下令秘密逮捕周兴，并由来俊臣负责审讯。来俊臣深知周兴是个搞刑讯逼供的老手，要他如实招供决非易事。于是，来俊臣趁周兴尚不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前，请他饮酒，以请教的口吻

对周兴说：“罪犯个个狡猾无比，用种种刑具都不肯招供，不知周兄审讯罪犯有何新招？”周兴洋洋得意地吹嘘说：“我一向有个奇妙的方法，就是用一只大瓮，四面架起炭火，烧得滚烫，然后把囚犯放进去，你看他招不招。”这时，来俊臣奸笑一声，立即叫人搬来一只大瓮，烧得通红，厉声喝道：“周兴，你图谋造反，已被揭发，我奉密诏惩办你，现在就请君入瓮！”周兴一听吓得瘫倒在地，认罪伏法。这是酷吏周兴滥施刑讯反而自食其果的故事。对酷吏尚且可用如此残忍刑讯，对一般老百姓就可想而知。

(3) 判决执行制度

唐代以罪刑的不同有不同执行的规定：徒刑和流刑应按期送配所劳役，稽留不送的，一日答 30，三日加一等。死刑应在复奏皇帝批准下达三日后执行，并应依法定方法执行，应处斩刑的处了绞刑，或者应处绞刑的却处了斩刑，处司法官一年徒刑。死刑一般公开执行，采取“斩于市曹，与众弃之”的示戮制度，重者陈尸三日，以示惩戒。唐代承继汉代以来的秋冬行刑制度，死刑应在所谓肃杀之气的秋分季节之后执行，

如果在立春至秋分之间的万物生长的季节里执行死刑，要处司法官一年徒刑。对判处死刑的怀孕妇女作了限制性规定，应在产后 100 日执行。未产或产后未滿百日而行刑的，也要分别处司法官二年、一年徒刑。唐代还有“妇人犯罪非斩者，绞于隐处”（《唐六典·刑部》）的规定。这些规定被宣扬为施“仁政”。

（4）监政管理

唐朝在京师、州、县普遍设置监狱，各监狱都设有主管的官吏，其组织系统和管理机构都比较完备。唐朝统治者重视狱政，刑部每年正月要派遣使臣去巡查。唐律规定囚犯应戴刑具而未戴、脱去或改变刑具，主管狱吏要处笞、杖刑，还规定了囚粮、医药和入视的制度。凡是应给囚犯衣食、医药而不给的，应让其家属入视而不让入视的，应脱去刑具而不给脱去的，处狱吏 60 杖。狱吏窃减囚犯口粮致死的，处绞刑。这些规定是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而制定的，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实行。

四 发 展 篇

——宋元明清时期的法律制度

宋元明清是中国封建经济关系进一步发展时期,封建的租佃制和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土地转移加快,集中趋势加强。宋元明清又是中国封建政治法律制度进一步发展时期,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加强对劳动人民的束缚和镇压,以维护业已没落腐朽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

1 宋朝的立法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统一。他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秩序,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活动。

(1)《宋刑统》的制定

宋太祖即位后第四年(公元963年)命窦仪等人修订法律。窦仪是前朝元老,懂得

如何修订法律。他和苏晓、奚屿、张希逊、陈光父、冯叔向等人，在总结唐朝和后周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所谓“刑统”，是中国封建社会刑法和刑律统类的省称，是律文和敕令混合编纂。略同于刑事法规汇编，并有释义。唐朝和五代都有刑统。

《宋刑统》修成后，宋太祖于当年八月下诏刻板印刷颁行全国，成为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刻板发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共30卷，包括律12篇，有502条，每篇之下分若干“门”，共213门。其内容与《唐律》基本相同，但在形式上有些不同。《唐律》有篇条体系，无所谓“门”；《宋刑统》首创篇下分门，特别详尽。

《宋刑统》颁布后，中经宋神宗、哲宗、高宗几朝敕次修改。但由于它是宋代开国以来第一部法典，继承皇位的几代君主都不敢轻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动都很小，可以说它“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2)“编敕”和敕律并行

宋朝的法律因袭唐律，但唐律的内容

不能完全满足宋朝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皇帝要随时发布敕令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与唐朝一样,“敕”是皇帝发布政令时采用的一种公文形式,一般用于下达处理日常政务。宋代的敕书应用极为广泛,经常使用敕书来处断案件,从而使敕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规范。敕发布多了,时间一长,前后可能有抵触,必须进行汇编整理,删去过时的,保留有用的,这就是“编敕”。也就是说,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经过汇编整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条文。可见,编敕是宋代一项非常重要的立法活动。

宋朝编敕极其频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变年号,都要重新编敕。宋朝皇帝政元多,编敕也就多,以至于到底有多少部编敕,实难统计。编敕实质上是对《宋刑统》的重大修改。而且,与刑统相比,编政可以随时发布,运用起来灵活得多,统治者随心所欲地经常编敕来满足它的需要。这一来形成了律敕并行,即在保持《宋刑统》的应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提高政的地位,在审断案件时加以引用。这是宋代立法的特

点。

2 宋朝刑法的特点

宋朝是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时期，大小数百次，前赴后继，连绵不断。一部宋朝的历史，既是农民革命波澜壮阔的画卷，又是宋朝统治者镇压农民革命的黑暗记录。这一点在宋朝刑法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1) 加重对“盗贼”的处刑

宋初，统治者就加重了有关“贼盗”的立法。例如，宋律规定盗窃罪其赃款赃物共计满五贯（一千钱为一贯）者处死，不满五贯者也处脊杖 20，配役三年。神宗时，对盗窃罪，一般处死刑，妻子发配千里，并没收财产赏给告发人，再犯者即使从犯也处死刑。这比唐律要重得多。宋代法律以对盗窃罪处刑严厉著称。宋太宗时，老百姓在青黄不接时剥吃地主的树皮，宋律规定如果树枯死了，以枯树的尺寸计算，42 尺为一功，三功以上处死刑。

(2) 划分“重法地”和“非重法地”

为了加强对农民起义的镇压，强化治安措施，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

立《盗贼重法》，将全国划分为“重法地”和“非重法地”。所谓“重法地”，是人民反抗斗争高涨的一些危险地区，即统治者认为需要重点镇压的地区。凡是在重法地犯罪的要加重处罚。起初，重法地仅限于京城开封府附近，到神宗元丰年间，扩展到河北、东京、淮南、福建等路。这一点反映了宋朝阶级斗争不断激化。

(3) 折杖法和刺配法的制定

宋代的刑制，沿用隋唐的五刑制。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 963 年）制定“折杖法”，将流刑、徒刑、笞刑折合为杖刑。杖刑分杖脊和杖臀两种。《宋刑统》规定，徒刑改杖脊，不执行刑期；笞刑改为杖臀，减少杖数；流刑减为一年期，外加杖脊。

宋代还制定“刺配法”。“刺配”是脸上刺字而后流配充军。这是奴隶制时代肉刑之一黥刑的复活，等于隋唐以来实行的五刑之外增加一个刑种。

宋代黥刺刑罚适用很广。宋真宗时关于刺配的法律规定有 46 条，仁宗庆历时有 170 余条，南宋竟多达 570 条。宋律规定，流、徒、杖刑都可以同时黥刺。一般作为附

加刑使用，特别流刑和充军，一定要附加黥刑。而且黥刺的方法多种多样。初犯刺于耳后，再犯、三犯刺于面部。流刑、徒刑犯刺方形，杖刑犯刺圆形，直径不过五分，也有刺字的。《水浒传》中的武松，刺的是两行金印。强盗犯、窃盗犯在额上刺“盗”、“劫”等字样，脸颊上还往往刺有发配的地点。这一来，一人之身，一事之犯，要兼受杖其脊、配其人、刺其面三种刑罚，比唐律要严酷得多。到南宋孝宗时，到处充斥被刺配的人，全国各郡牢狱达几十万人。宋朝的刺配法对后世有直接影响，元明清均沿袭来改。

(4) 增加凌迟刑

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8年)，对死刑的处决方法，除绞、斩之外，增加凌迟刑。“凌迟”，俗称“剐”，执行时先断犯人的肢体，再出其脏腑，支分节解，体无完肤，最后毕其命。“凌迟”，原为“陵迟”，指丘陵逐渐低下去。在这里，是使将处死的犯人缓慢地死去，加重死者的痛苦。这是中国古代生命刑中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元、明、清因袭这种刑罚，清末才废除。

3 宋朝的租佃制和典卖制

宋代,土地买卖和转移加快,中小地主增加,官田已不再是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大多数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占有,形成私人田庄,有少部分土地归自耕农所有。由于租佃制的经济关系广泛地发展起来,典卖制也很盛行,因此,推动了民事立法。宋朝法律确认地主、自耕农的土地私有权,发给他们“红契”,作为土地私有权的凭证。

宋朝政权为了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把唐以前打击、抑制兼并的政策改变为不限制兼并和保护地主阶级土地私有权的政策。大土地所有制发展起来。大官僚、大地主在自己的田庄上建筑华丽、高大的屋宇,并强迫佃户寄住庄上,私蓄兵器,建立武装。《水浒》传里的“祝家庄”,就是祝姓大地主的田庄,庄名就是村名。这种田庄就是北宋的土地占有制的主要形式。到1033年,全国耕地的70—85%,被朝廷、官僚、地主占有。宋朝法律规定,盗种公私田者,要受到笞刑或徒刑的处罚。

宋代租佃制更为普遍,地主和佃农签

订一年或几年的租佃契约。《宋刑统》和敕都确认租佃制度，维护地主的权益。宋律规定，租佃契约到期，租佃关系结束，农民可以另租土地，地主可以另佃。契约未到期，禁止佃户逃离，也不允许地主私自处置佃农，不得随意撤佃。佃户欠租，官府要以强力帮助地主索取。尽管当时佃户的法律地位很低，但与“部曲制”的部曲（唐以前地主豪强私家的部属、家仆，身份地位比奴婢略高）相比，地位和处境好一些。

宋代，典卖土地、房屋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被法律所承认并形成制度。所谓“典卖”，又称“活卖”，是指将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出典给他人，收取一定的典价，在约定期限内原价赎回。“活卖”与“绝卖”不同。绝卖是所有权的转移，不能赎回。由于典卖土地、房屋者大多数是贫困无贷的农民，典价又大大低于卖价，地主豪强利用典卖制度不仅廉价取得土地、房产的使用收益权，而且还可以取得土地、房产的所有权。据宋代朱晦庵等人编的《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当时“豪民图谋小民田业”，出典人要求赎回典物时，“则迁延月日，百端推托”，辗转

数月,已经到了赎典截止的期限,使得出典人终无赎回之日。宋律规定只有典契验明显然者,才允许业主收赎。这些都是维护典权人的利益,为典权人取得出典人的田宅提供了便利条件。

4 元代立法和元律的特点

元代(公元 1279—1368 年)是蒙古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蒙古族原来没有文字,也没有成文法。到铁木真(公元 1162—1227 年)时才开始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语,并将他的训令写成法规,叫“大法令”,蒙古语叫“大扎撒”。从它流传下来的条文看,其内容从饮水吃肉到处置俘虏无所不包,是一种较为原始的法律形式。

忽必烈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下诏“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并着手制定元律。元朝第一部新律叫《至元新格》。它是由中书参知政事何荣祖主持制定,于至元二十八年(公元 1291 年)刻版颁行的。它不按唐律篇章结构,是大致取一时所行事例,编为条格的。“条格”即敕,是重要的法律形式。

元仁宗时,将有关风纪的条格汇集成

一部《风宪宏纲》。元英宗在位仅三年（公元1321—1323年），却制定了两部重要的法典。一是《大元通制》，包括制诏、条格、断例等部分，是皇帝诏令和案例的汇编，有刑事、民事、行政、军事等方面法规，内容比较丰富，总结了元世祖以来60多年的法制事例。二是《元典章》，全称《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它是江西宣抚使编集的，但已“呈迳”中书省，并经中书省核准下达各地“照验施行”的，应当认为是元朝中央政府颁布的法律，是地方政府的一部法规汇编。这部法典完好地保存到现在，记载了元代社会生活、政治法律制度的许多珍贵史料。到元顺帝时编纂了元朝最后一部法典《至正条格》。

元律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公开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元朝统治者按民族标准把人民划分为四等：蒙古人为一等；色目人（西夏、回回、西域人）为二等；北方汉族、契丹人、女真人等为三等；南人，即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和西南地区各族人民为四等。汉人在政治上处于最低地位，连生命也得不到法律保障。元律规定，蒙古人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因争吵、酗酒打死汉人，

最多罚其当兵和赔偿“烧埋银”，即丧葬费；但在相同情况下，汉人打死蒙古人或色目人，要立即处死，还要出五十两“烧埋银”。此外，蒙古人犯罪还享有许多特权，例如，不得刺字、拷讯，除死刑外，概不监禁。蒙古人犯法，只能由管理蒙古人的专门机关——宗正府决断，一般司法机关无权受理。相反，汉人犯罪必须由蒙古人决断。

元律限制和剥夺汉族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严格禁止汉人、南人私藏武器，统治者经常下令没收他们的军器、马匹，不许他们练习武艺，结社集会，甚至连打猎和夜间点灯都一律禁止。

元朝竭力保护蒙古贵族地主的利益，同时扶植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和加强他们的统治基础。元律规定，农民除必须向地主阶级缴纳五成至八成的高额地租外，还要按亩交纳蚕丝或鸡鸭等实物。地主对佃户可以任意撤佃，禁止将佃户连同土地一起典卖、赔人，地主有权奴役佃户及其妻、子女，对他们实行私刑凌辱。元代的佃户实际上是农奴，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是历史的倒退。

元律确认蓄奴的合法性。奴、婢或称“驱口”、“流民”，是最受压迫的社会阶层，其处境近似奴隶。他们世世代代当牛做马，遭受主人的鞭挞、凌辱，甚至被买卖。当时陕西行省行政长官张养浩（公元1269—1329年）写了一首《哀流民操》的长诗，对丧失土地沦为“流民”的农民，作了描述。诗中写道：

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

哀哉流民！男子无温饱，妇女无完裙。

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得其根。

哀哉流民！昼夜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

哀哉流民！死者已满路，生者与鬼邻。

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粟，一儿钱数文。

这些诗句充满着劳动人民的血泪，比较深刻地反映元朝的阶级矛盾，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面。

5 朱元璋与明朝立法

中国古代法制史中，历代开国君主都比较重视修定法律，朱元璋尤为突出。

1364年，朱元璋打下武昌。此时，他虽

尚未建立起明王朝，但已考虑到“正纲纪，立法度”，经常在他的吴王府西楼上召见议律官，请他们坐下来，从容讨论律文。他认为“元氏昏乱，威福下移”，“不知修法度，以明军政”，也就是说，元末法纪废弛，吏治腐败，招致灭亡，因此，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不可不猛。他还认为“法贵简当，使人易晓”，条款不可繁琐，律意不可含糊。

(1)重典《大明律》的制定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即帝位，建立明王朝后，便召集儒臣和刑官每天给他讲解20条唐律，以便为制定一部新法典作准备。公元1373年（洪武六年），朱元璋命刑部尚书刘惟谦编修《大明律》时，每拟好一篇呈上贴在宫内庑廊之上，由他细细审定。第二年，《大明律》修成，分12篇，“篇目一准于唐”，是唐律的翻版。1397年（洪武三十年）最后完威的《大明律》，共30卷，460条。这时，朱元璋已70岁高龄，为颁行《大明律》，他亲临午门主持典礼，发表谕旨。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法典中比较成熟的一部法典。在体例上，明律突破了唐律

12 篇的老传统,首创按六部分类的形式,共七篇:名例律、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这是中央集权加强在立法形式上的表现。在内容上,明律与唐律的精神实质相同,但是明律对轻罪的处罚,比唐律要轻;对重罪的处罚,比唐律要重。即所谓“轻其轻罪,重其重罪”。这是封建统治和司法镇压经验的总结。朱元璋在《大明律》序文中说:“出五刑酷法以治之,欲民畏而不犯。”他要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也就是说用礼法并用的两手进行统治,对一般人民用儒家的礼义来教化,对不听教化而决意进行反抗的“顽民”,则用法律来镇压。

(2) 酷法《明大诰》的颁行

朱元璋吸取元朝纲纪废弛以至覆亡的教训,提出“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在制定《大明律》的同时,于 1385 年(洪武十八年)颁布了《大诰》。“大诰”,原是帝王对下臣的告诫。早在西周时周公对殷商臣民的训诫,被编成《尚书·大诰》。朱元璋效法周公,把自己的严刑峻法称作大诰也是中国古代立法史上的独创。

《明大诰》共有四篇，236条，包括法外用刑的具体案例，朱元璋对臣民的训诫以及为惩治吏民的特别法。《明大诰》是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部法典，是超出五刑的酷法。它不但任意扩大了族诛、凌迟等酷刑范围，还公然把早已废除的肉刑列在《大诰》上。例如，挑筋、断指、刖足、割鼻、断手、阉割等。

《明大诰》不仅是办案的根据，还作为必修课程，朱元璋下令“全国军民人人诵习”。要求塾师宣讲《大诰》，民间也要习读《大诰》，做到家传人诵。家藏《大诰》，犯罪可减等处罚。全国争购《大诰》成风，一些士大夫也以此作为进身之阶，争相讲读。

朱元璋为什么这样重视立法？在《皇明祖训》中有他一段话可以得到解答。他说：他“起兵四十余年，亲理天下庶务，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他有能力驾驭臣民。但是后世子孙是“官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他们将来做皇帝时，恐其威严不足，所以要制定一部“历代相承”的法律，使“子孙守之”。一句话，就是用法律来维护朱明王朝的统治。

6 明律的主要特点

明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经济和专制制度的发展,构成明律的主要特点。

(1)加强了对危害封建专制统治行为的刑事镇压

明律对于人民反抗封建国家统治和专制皇权的谋反罪、谋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则,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凌迟处死。诛连的范围更广,凡年满16岁以上的子孙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对谋叛罪,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没入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子孙兄弟皆流2000里。这样,经常是一案诛连数十人,甚至满门被斩、灭族。

(2)设立“奸党罪”专条,严禁臣下结党和内外官交结

朱元璋吸取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的教训,在明律中设立了“奸党罪”专条,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内外官交结,

大臣专擅选官，处斩；大臣的亲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这是历代法律中所没有的，反映了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杀死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吏有三万人。

（3）重典整饰吏治，严惩贪官污吏

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对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体会。他即帝位后，用重典整饰吏治。据《醒贪简要录》记载，官吏贪赃银60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官府常常人皮内塞草，作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明律规定，官吏犯赃罪的处刑极严，计赃科断，一贯以下杖70，80贯处绞刑，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责任，并且不得赦免。1385年（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下令

法司拷讯，六部侍郎以下有数百人被处死，各直省官吏有数万人被牵连入狱，追赃达700万担粮。大将军蓝玉建有奇功，远征漠北，曾俘虏元主次子、后妃公主130多人，将校30余人，男女7万口，马匹骆驼5万头。但他恃功自傲，目无法纪。明太祖在赏赐给他铁卷（颁发给功臣以法律特权地位的凭信）时，著上他的功勋，也镌上他的过错。蓝玉对此不满，企图叛乱。明太祖得知后，果断地将他及其同谋一网打尽，株连被杀者有15000多人。

7 明朝的经济立法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从1370年（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十四万于风阳”（《明史》卷77《食货志》）。迁山面晋城、长

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植，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松江是棉纺中心，民谚说：“买不尽的松江布，收不尽的魏塘（今浙江嘉善）纱”，盛况空前。为了加强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和控制，《大明律》专设《工律》一篇，对军民官府营造的申报审批、营造所需材料、财物、人工，造做器物的品种规格等等都作了规定，违反者治罪处刑。明朝前期有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生产组织。官营手工业生产规模比较大，经常有几十万技术高超的工匠轮番劳动。行业多，分工细。工匠分轮番匠和住坐匠两种。轮番匠每三年到京服役三个月；住坐匠固定做工，每月有 $\frac{1}{3}$ 的时间为官府做工，月粮由国家支給，其余 $\frac{2}{3}$ 的时间自由支配。这种工匠比元代长年固定在官府生产的工匠，有

了较多的人身自由,从而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对于矿冶业,对非贵金属允许自由采矿和冶炼,官府课税;对金银等贵金属矿只能由官府经营,其他与国计民生关系较大的铁、铜、铅、锡等矿藏,必须取得官府批准,才得开采,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开挖者,以“窃盗罪”论处。

对商业,明代承袭前朝旧制,对某些重要商品,如盐、茶等实行专营制度。明律规定,盐和茶都由国家专卖,商人必须向官府交钱买“盐引”和“茶引”。“引”是商人运输货物的凭证,印有法定的重量单位。盐引有大小引之分,大引 400 斤,小引 200 斤。茶引不分大小,每引 100 斤。明洪武元年修定的《盐引条例》,规定犯私盐罪者绞,有军器者斩。其后在《大明律·盐法》规定,凡犯私盐罪者杖 100,徒三年;若有军器者加一等,拒捕者斩。明朝统治者凭借国家暴力,对有较大市场、利润较大的商品垄断在官府手里,使民间商业的经营范围缩小,极大地限制了民间商业的发展。

明朝的税法有田赋和商税。明初依照

唐代的两税法，核定天下田赋，其数额列入《黄册》，即户口册，详细登记各地居民的丁口和产业情况，每年审查一次。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制定耕地的总清册，将田主的姓名和土地的位置，分别登记，编成《鱼鳞册》，作为征税的依据。田赋分夏税和秋税两种，夏税收麦，秋税收米，官田亩税五升多，民田亩税三升多，重租田八升多。到明中叶，由于赋役苛重，人民纷纷逃亡，生产受到破坏。自嘉靖至崇祯年间进行赋税改革，推行“一条鞭法”。其主要内容是：各项复杂的田赋附征和各种性质徭役一律合并征银；徭役中的力役改为以银代役，由官府雇人充役；徭役银不按户丁分派，而按地亩承担；以县为单位，将全部徭役银分配一县的田额上，平均负担，改变丁原米按里分摊的办法。“一条鞭法”既是税制化繁为简，又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有利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具有进步意义。

明代改变宋元以来商税繁苛的情况，规定商税率为1/30。明神宗时，派出税监到全国各地去监督收税，逼得机户停机、窑

主歇业、盐工抗税、矿工暴动、市民罢市。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内监孙隆到苏州充任税监,他勒令除已征税外,每机加派白银三钱,丝织品每匹加银三分。机户因此停工,几千织工染工失业。生活无路的织染工匠2000人集结于玄妙观,公推织工葛贤等几人为首,高喊“赶走孙隆,杀死税棍”的口号,冲向税监衙门。斗争坚持了三天,打死税官、恶棍十余人,火烧了税监衙门,孙隆逃跑了,加派的税银取消了。

8 清朝立法和清律的特点

公元1614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立了后金政权,制定了军政法令,开始了由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过渡。1626年,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即位,10年后被拥戴为皇帝,建国号大清。这个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马背上的君王,在取得全国政权后所考虑的问题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弱小落后的民族,如何去统治有数千万人口的先进的汉族呢?为此他提出了“参汉酌全”,“详译明律”的法制思想,明确表示法制是“立国之本”。这一点表明清朝统

治者一开始就表现出比较成熟的统治经验,他们懂得只有适应汉民族先进的生产力和经济关系,以及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伦理道德,才能够长期站稳脚跟。清代的几位统治者——皇太极、多尔衮、顺治、康熙,都是遵循这一思想路线从事立法工作的。

(1)《大清律例》的产生

1644年,清入关后,设置律例馆,组织了一个满汉官吏相结合的立法参谋班子,进行全面的立法活动。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制定《大清律集解附例》,于顺治四年颁行全国。这是《大明律例》的翻版。康熙时,对这部律文附例作了校正。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再次颁行《大清律集解附例》。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在逐条考正原有律例后,编成《大清律例》七篇,47卷,30门,律文436条,附例1049条,“刊布中外,永远遵守”。此后,大清律被后世皇帝视为“祖宗成法”,不再修改,而是用陆续增加附例来弥补律文的不足。《大清律例》的产生历经四朝,历时近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律文中规定的内容详尽。它集历代法律之大成,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比较完整

的封建法典。

(2) 各部院则例

清代从康熙时起,为加强对国家机关的管理,充分发挥它的职能,陆续制定各部院则例。主要有《刑部现行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户部则例》、《钦定礼部则例》、《钦定中枢政考》、《钦定工部则例》、《理藩院则例》、《兵部督捕则例》等。“则例”是清代的重要法律形式,数量很多,在调整国家行政管理方面起重要作用。

(3)《清会典》和单行法规

清朝仿照明朝做法,从康熙至光绪,都编修会典。有《康熙会典》、《雍正会典》、《乾隆会典》、《嘉庆会典》、《光绪会典》。这些会典记载了清朝各机关的编制、职掌和事例,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典,其内容比唐六典、明会典丰富,体例也更为严谨。

唐王朝除了强调法律政令的统一之外,还根据统治少数民族地区的需要,变通地制定了许多单行法,如《回律》、《番律》、《蒙古律》、《苗律》、《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等。这些法规为团结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巩

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一定作用。

(4) 清律的特点

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极端专制主义的王朝。它以严酷的刑法手段推行政治、思想的高压政策,确保其统治。清律中扩大了对反逆罪的诛连范围,凡谋反、谋大逆者,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并诛连其父子、祖孙、兄弟及同居的人,连伯叔父、兄弟之子也要处斩。清律中沿用明律中有关“奸党”罪的条款,严禁大臣交结朋党。并且大兴文字狱,惩罚异端思想。

清律除端承明律中确认封建等级制度外,还特别规定了满族享有一系列法律特权。例如,在经济上确认满族人通过圈地所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制定“旗民自首私垦余地”的条款,听任他们掠夺土地。

清律继承明律实行重要商品专营制度,以重法实行海禁。清律规定:“寸极不许下海”,违禁者不论官民,一律处斩,货物入官。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还颁布《迁海令》,强迫东南沿海各省居民分别内迁50里,焚毁沿海城廓庐舍,有越界者立斩。

到康熙二十三年(公元 1684 年)才放宽海禁,但只准载重 500 石以下的小船出海。清律还严格限制手工业和采矿冶炼业,苛刻细密的封建法网,死死地禁锢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摧残资本主义的萌芽。

9 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明朝的中央司法机关组织和名称与唐宋时期基本相同,但职权管辖有所不同。它设立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称“三法司”,刑部受理地方上诉案件,审核地方重大案件和审理中央百官案件。大理寺不掌管审判,专门对刑部审理的案件进行复核。都察院是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监督刑部和大理寺的司法活动。“三法司”对重大案件实行联合审判,叫“三司会审”。“三司”会审后的判决必须报请皇帝批准。

清代的中央司法机关与明代的基本相同。中央的最高审级是“九卿会审”。它是六部尚书加上都察院左都御史、通政史和大理寺卿组成。每年审理死刑案件的“秋审大典”,九卿都参加。

秋审是清代由朝廷官员定期复审外省

死刑案件的一种会审制度，因在每年秋季举行而得名。明朝时便已有，它是在每年秋后霜降时举行的。清朝沿袭下来。清律规定，凡严重危害封建统治的重大犯罪，应立即处决的，叫做“斩立决”或“绞立决”，对危害性较小或有可疑者，暂判“斩监候”或“绞监候”，延至秋天由九卿会审时重审决定。每年秋审之前，各省督抚必须将有关案件先行审核或审讯，并提出处理意见，于五月中旬前分别送给九卿，供秋审参阅。到八月份，九卿等官员到天安门外金水桥西会同审理。因人犯监禁在各省，秋审只凭检册审核。秋审后，上奏朝廷，经皇帝御笔勾除者，才能正法。

秋审后不久，到霜降后十日，九卿对刑部判决的案件或京师附近斩监候或绞监候的重囚犯送行复审的制度，叫朝审。这是明英宗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首创的。清代把处理京师案件称“朝审”，处理外省案件称“秋审”。

明清时，除秋审和朝审外，还有“热审”。这本来是中国古代于夏天为疏通监狱而设的审判制度。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

1404年)重又实行,清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定为制度。热审于每年小满后十日开始,至立秋前一日为止,对不是犯死罪及流罪的犯人,酌情予以减等,笞刑杖刑宽免;监外带枷号的犯人,暂行保释去枷,到立秋后再补枷。

经秋审和朝审的案件,有四种处理方法:情实、缓决、可矜、留养奉祀。“情实”,即罪情属实,处刑恰当,这类案件奏请皇帝批准执行死刑;“缓决”,即案情属实,但危害性较小,留待下一次秋审或朝审时处理;“可矜”,即案情虽属实,但情节不严重,可免予处死,一般属于老幼废疾等人犯罪;“留养奉祀”,即情节虽严重,但父母、祖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可免予处死。

明清朝会审制度虽然存在形式主义、文牍主义的种种弊端,但它有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对地方和中央司法机关的活动也是一种监督。

10 明清时期的文字狱

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兴文字狱。凡是与皇帝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言

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náo 挠)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这句话被认定为辱骂朱元璋当过和尚,因“生”音同“僧”,作过贼,因“则”音同“贼”。徐因此被处死。从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公元1384—1396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清朝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用刑法手段惩罚“异端思想”,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搞文字狱。康熙年间,庄廷钺从明朝宰相朱国祯的后人那里,买得一部《明史》中的《列朝诸臣传》尚未刊行的稿本,连同他自己所补写的崇祯历史,刊刻发行。书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不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此书被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当时,庄廷钺已死,清朝下令开棺戮尸,其兄弟、子侄及刻书者、读书者、保存该书者70余人,全部处死。

乾隆时的文字狱达到顶峰,次数多,处刑残酷。例如,1755年,胡中藻在《坚磨生诗钞》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与一世争

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被指责为在“清”的国号上加“浊”字，有夷、蛮等字样，犯了诋骂满人的罪行。胡中藻因此被处死。又如，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徐述夔写的《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和儿子被戮尸，孙及校对人被处死。此外，著名诗人沈德潜，因他的《咏黑牡丹》一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也被剖棺戮尸。从冯王孙所著《五经简咏》一书中，找出“飞龙大小见，亢梅更何年？”；从石单槐所著《茶园诗钞》中找出“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从祝庭舒所著《续三字经》中，找出“发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说他们反清复明，分别被戮尸、凌迟处死，子孙坐斩，家属发遣为奴。

文字狱是清朝统治者挑剔文字过错兴起的大狱，是专门对付文人的“特刑庭”，是统治者进行政治镇压、钳制思想，巩固其独裁统治的手段。文字狱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想沉寂窒息，加深人民的不满。这是清王朝衰落和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